

1920年代小組的 非列寧主義淵源—— 一個青年政治技術史的分析

汪正晟*

本文從青年政治技術史的角度，探討國民革命期間小組習氣的現象與淵源。小組政治技術並非僅自蘇聯引進，早在以俄為師之前，中國青年就從英美管道接觸到小組實踐；朱光潛則在試驗美國道爾頓制(Dalton Plan)教學法時，寄託了以小組共同生活形塑個人自由研究的理想。不少留蘇中國青年則直接將道爾頓制自主學習的想像，加諸於莫斯科中山大學等幹部學校之上，倒逼中共旅莫支部與校方配合改進。在國共合作下的上海大學小組，即使經過民主集中制的訓練，學生仍帶有自由研究的濃厚小組習氣。小組政治技術，與其說為列寧主義所獨創，不如說是世界性青年政治結構下，引進歐式教育理念的自然結果。

關鍵詞：國民革命、民主集中制、列寧主義政黨、小組習氣、道爾頓制、中共旅莫支部、青年政治、政治技術、上海大學、中共黨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

從政治技術角度研究國共歷史，近來有方興未艾之勢。學者普遍注意到，在國共兩黨的發展過程中，政治技術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此處政治技術指的是，為遂行政治目的或運作而採取的技術手段。所以稱為技術，以其具有相對明確可控、足資傳授學習的原理與步驟，存在著體系化規模運用的可操作性。據此，諸如階級劃分、開會、批評與自我批評、辯論、調查研究、數目字管理、小組會議，乃至各類民主選舉實踐，皆因能透過大致標準化的規則流程，在政治實務中得到普遍有效應用，而可稱之為政治技術。¹正由於能將政治技術更加系

¹ 早期學者雖不用政治技術一詞，但已注意到政治技術現象，如陳永發對於土改階級劃分，與中共建國後工商稅收方法的分析，已對政治中的技術策略有所闡述。見陳永發，〈中共建國初期的工商稅收：以天津和上海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8(臺北，2005)。黃道炫近年從心靈史角度分析抗戰時期中共幹部與基層組織，並沒有用政治技術一詞，但實為當今政治技術研究之開創者。在他啟發下，一批學者開始注意諸如會議方式、婚戀管控、檢查工作等技術性措施中體現的中共核心特質。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有關開會，可見宋泓，〈開會：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治〉，《清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7:4(北京，2022)，頁113-127、225。有關批評與自我批評，見余敏玲，〈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8(臺北，2022)，頁89-139。黃江軍，〈整風運動的技術史：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22:1(北京，2022)，頁67-80、160。黃江軍提出用技術史一詞含括政治技術相關研究。趙諾的研究涉及中共幹部政治的各個部分，運用極為細緻的反省自傳材料呈現整風政治技術中自我認知的變化。趙諾，《太行山上：中國共產黨太行根據地幹部政治成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王龍飛也利用基層會議資料展示中共結合民兵與村政權的手法，以及管理民兵的具體技術，見王龍飛，《全

統性地融入幹部教育訓練的過程中，中共黨員普遍具備更強的政治判斷與實踐能力，得以在己方弱小的處境中堅持發展，逆勢擴張，終於能轉弱為強，建立政權。對政治技術的運用，國民黨雖然不如中共，但也能基於自身需要改良，取得一定成效，未可全以中共標準評價。²不同於意識形態與制度史分析，政治技術的視角為我們理解國共成敗與兩黨政治文化，呈現了更多動態政治過程，不僅可以為經典的政治事件、政治鬥爭解釋補充細膩的實務與人員思想言行細節，還可能與宏

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關於小組技術，見汪正晟，〈從青年敘事論國民黨小組會議與中共政治技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5(臺北，2022)。任育德討論了國民黨在臺灣運用小組向地方基層紮根的努力，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北縣：稻鄉出版社，2008)。孫會修近年來運用一手俄文與俄藏中文檔案研究旅莫支部，為旅莫支部課題開創了有別於傳統黨史論述的新視野。他肯定了旅莫支部與留蘇學生在組織建設與幹部訓練方面的成就，展示了早期中共小組許多政治技術的萌發。孫會修，〈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小組指導員問題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24：2(北京，2024)，頁111–123。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的幹部訓練(1921–1926)〉，《民國檔案》，2025：1(南京，2025)，頁108–118。

²張瑞德探討蔣中正培養、選用人才的制度性與非制度性途徑，如養士，也涉及較為傳統政治中的技術面相。張瑞德、馮啟宏，《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4)。馬思宇比較國、共、青年三黨彼此模仿、競爭幹部訓練的關係，馬思宇，〈三黨競訓與1920年代中國政黨訓練的源起〉，《民國檔案》，2022：2(南京：2022)，頁119–130。關於國民黨如何仿效中共政治技術，見盛差昶，〈全民族抗戰時期國民黨對中共組織建設理論的借鑒——以《黨的建設》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24：4(北京，2024)，頁104–115。亦可見汪正晟對小組會議的研究，汪正晟，〈從青年敘事論國民黨小組會議與中共政治技術〉，以及汪正晟，〈青年政治運動之底蘊與兩難——以浙江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為例(1938–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5(臺北，2019)，頁91–147。以上學者皆強調國民黨對政治技術有自己的思考，對中共的借鏡並非盲目。

觀的歷史結構與文化政治互相印證，透過政治技術的現象說明背後深層的歷史本質。不過，目前政治技術研究主要仍聚焦於國共自身的演進脈絡，較少關注政治以外的因素，政治技術遂容易被理解為列寧主義政黨體制或是傳統文化的特殊產物，從而為政治技術中所包含之超越左右的現代性共同根源，留下進一步闡釋的餘地。其中，青年既然是由現代性產生之最重要的政治行動者，青年政治想像與技術之間的關係，尤其值得深入發掘。³基於此一問題意識，本文以 1920 年代的

³ 叢小平很早即分析師範學校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呈現師範教育制度及其校園生活在促進學生激進化過程中的作用。Xiaoping Cong (叢小平),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李志毓率先關注國民革命中青年群體主體狀態，從他們自身思想行為理路，而不是政黨路線，解釋國民革命中政治現象的成因與意義，李志毓，〈中國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1924–1928)〉，《南京大學學報》，2015：3(南京，2015)。宋明燁參考德國成長小說的文學理論，以中國近代小說中的青春題材為研究對象，極富洞見地指出青年是現代性建構的敘事與主體認同。他也注意到中國青年文化政治不斷呼喚重新開始，卻沒有如德國那樣，完成了對自我的超克而趨於成熟。其對青年自我的西方起源與特徵有相當深刻的闡述，極大拓展了青年政治史的問題意識。不過，宋明燁主要將青年視為被動受歷史與政治塑造的文化現象，多討論青年政治的論述與背景，較少關注青年政治的技術實踐，以及其主動影響政治，乃至反詰西方典範的一面。見 Mingwei Song (宋明燁), *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黃金鳳全面闡釋了早期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共的競爭關係。黃雖未處理具體政治技術，但已注意到國際背景下的青年習氣對中共政治措施走向的影響，筆者深受啟發。黃金鳳：〈從「第二黨」到後備軍：共產黨與青年團早期關係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11：3(北京，2011)，頁 123–138、161。汪正晟探討了青年政治與整風中自我解剖技術相生相剋的關係，汪正晟，〈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新史學》，32：1(臺北：2021)。張歷君研究瞿秋白的專書亦涉及世界青年政治現象，如瞿秋白政治思想中的日本大正生命主義因素，以及對領導權(hegemony)的重視，張歷君，

小組政治技術為主要研究對象，指出蘇聯並非小組政治技術的唯一來源。在以俄為師以前，中國青年如惲代英(1895–1931)等人，就從英美等西方管道接觸到小組實踐；朱光潛(1897–1986)則在試驗美國道爾頓制(Dalton Plan)教學法時，寄託了以小組共同生活形塑個人自由研究的理想。一些懷揣著道爾頓式自主學習想像的留蘇中國青年，甚至對蘇聯幹部教育投射了相關期待，於是對蘇聯粗枝大葉的小組指導頗為失望，反而試圖倒逼校方配合改進。最後，本文以國共合作的上海大學小組為例，說明即使經過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上海大學學生的小組仍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習氣。由此總結：小組政治技術，與其說是列寧主義刻意研發的密技，不如說是世界性青年政治結構下，引進歐式教育的自然結果。

最後有必要說明，本文所謂的「青年」，不同於常識或生理意義上的年輕人，主要是指在現代化、工業化變遷中出現的新世代認同，⁴青年因而普遍自認先知先覺與反建制。這種受西方現代性影響的「新人類」，魯迅(周樹人，1881–1936)在〈文化偏至論〉(1907)中，很恰切地名之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另外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與藍澤意(Fabio Lanza)分別由劇目(repertoire)與城市空間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上海與北京學生運動。夏海(Shakhar Rahav)則從武漢等地知識分子網路角度，探討大學與激進書店的社群聯繫如何導致政治知識分子在五四後的崛起。幾位學者皆強調了學生運動模式中較為地域性的成因，也偏向從文化解釋學生行為，但已間接涉及青年政治技術現象。Jeffre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Fabio Lanza, *Behind the Gate: 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Shakhar Rahav,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⁴ John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1981), 1, 38.

為「先覺善鬥之士」，⁵略等同於(新)知識青年或學生。對於一般認同傳統或未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農民或工人等，不在本文所謂青年之列。

二、道爾頓制：從自由研究到設計教學

在 1917 與 1918 年，當時李大釗(1889–1927)尚未在北大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 年 3 月)，中華大學(由教會設立)學生、未來的五四青年與中共領袖惲代英參加了武昌基督教青年會在廬山舉行的夏令會，結識了好友舒新城(1893–1960)，並由此成立社團，且對美國牧師主持的密集分組討論活動印象深刻。惲代英從劃一思想與紀律的角度，認為同人日日聚會切磋，「將來下山以後至少得與余同一之功效，或更大之功效。……上山之每日開會，由此觀之尤甚有必要矣。」⁶圍繞口頭論理、分組討論展開的西式思想教育實踐，可能從此啟發了他對政治技術的思考與行動。⁷無法確知惲代英以分組談話規訓組織成員的念頭起於何時，但他在 1923 年 2 月 5 日的《學生雜誌》上公開承認：「不錯，做改造社會運動的人，的確要利用學生」，⁸並將他構思的分組談話技術付諸實踐。約當此時，在教育家道路上前進的舒新城差不多正要為即將完稿的《道爾頓制概觀》作序。

⁵ 魯迅，〈文化偏至論〉，收入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第 1 卷，頁 52。

⁶ 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1917 年 8 月 31 日，頁 141；1918 年 6 月 29 日，頁 420–421。

⁷ 在 1941 年的回憶錄中，舒新城對廬山上的演講訓練印象深刻。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舒新城回憶錄》(臺北：獨立作家，2025)，頁 119。

⁸ 惲代英，〈學生的社會運動〉，收入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 5 卷，頁 51。

1920 年春，紐約附近的道爾頓中學施行了新教學法，始有道爾頓制之名。它其實是創發人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 1887–1973)女士總結其多年教學經驗而得。基本內容為「將一群無班級區分的中學學生依其學習程度評定安置於不同級次，然後依進步速度分配安排各級課程；教師的最重要責任，在於指導學生自主學習、自由研究，允許學生盡其所能，在自己選定的課程進度中努力前進」。⁹也就是以學生自主學習，取代由教師按統一進度，單方面向全班授課的教學方式。

1921 年，《教育雜誌》介紹了道爾頓制，舒新城立即熱烈倡導。¹⁰與當時許多推廣道爾頓制的知識分子理念相似，¹¹舒新城出於對傳統教學流於照本宣科的不滿，認為道爾頓制的「第一原則是自由研究」。¹²在《道爾頓制概觀》中，舒新城主要依據 1922 年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的實驗結果，認定道爾頓制是突破舊習，適應社會的「大革命」。¹³在他看來，當務之急是突破下述的保守思想：

從前主持中等教育者受了心理學者底暗示，大概以為青年底感情盛，判斷力弱，常懷一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無論是用於學生行為的指導或學科的教授，總以此潛在的思想為出發點。¹⁴

⁹ 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以近代中國推動兩個外國教學法為例〉，收入中國教育學會主編，《教改 20 年：回顧與前瞻》（臺北：學富文化，2014），頁 102–103。

¹⁰ 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頁 103。

¹¹ 關於中國知識界引進道爾頓制的背景、思路與盲點，可參考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頁 97–127。鄭玉卿，〈道爾頓方案理念及其在中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的實驗〉，《課程與教學季刊》，2（高雄，2012），頁 147–168。

¹² 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23），頁 200。

¹³ 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頁 201。

¹⁴ 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頁 202–203。

與這一保守觀點相反，舒新城認為青年有足夠的判斷力與自主性。他對道爾頓制的欣賞，主要即在於該制能培養青年「自動自主的習慣」。¹⁵

有意思的是，在道爾頓制下是否仍應容許教師設計課程一事上，舒新城支持教師透過設計教學內容與方法，積極介入本應自主的學習歷程。為加強此論點，《道爾頓制概觀》第 11 章索性直接以參與實驗的青年教師朱光潛的文章為內容。1922 年，朱光潛香港大學畢業，擔任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英文教師，就在《教育雜誌》(14:12)發表〈在「道爾頓制」中怎樣應用設計教學法〉，探討了道爾頓制與設計教學法的兼容問題。設計教學法(project method)由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克伯屈(W. H. Kilpatrick, 1871–1965)於 1918 年提出，1919 年初即為中國教育界大力提倡，其目的「在於廢除赫爾巴特學派五段式教學法的班級授課型態，打破學科界線，摒棄教科書，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自發決定學習目的和內容，且經由學生自己設計、自己負責實行的單元活動中，獲得有關的知識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¹⁶設計教學法較道爾頓制早出兩年，兩者宗旨大同小異，皆反對傳統(中國是晚清才引進的新制度)班級授課，追求發揚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換言之，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一年以前，即使學術性的社會主義組織活動尚在醞釀之際，如道爾頓制一類的理念實踐，已是中國教育界競相仿效的對象。當時知識人急切地引入西方最新教學理論，在教學實踐中也很快就發現：道爾頓制與設計教學法其實貌合神離，不如論述上看來相得益彰。1922 年，朱光潛仔細研究後開始指出問題。

在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一書中，朱光潛以主要篇幅詳述道爾頓制下如何設計教學，舉凡教學計畫的擬定、講授工具、演示步驟、提問技巧皆有具體細節的說明。由於設計教學法要求班級統一進度，難免衍

¹⁵ 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頁 204。

¹⁶ 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頁 99。

生抹煞個體差異的弊病；而道爾頓制尊重學生才性與自主學習的理念看來美好，似乎可以改革前者的缺失。但朱光潛發現，實際上，為了確保每個學生自主學習有起碼的成效，各科教師必須密切協調，在個別學生的學習計畫中，融入共同的基礎知識，乃至認知方法。換言之，道爾頓制表面上賦予學生與教師在學習與教學上高度的自主性，但若不願使這樣的自主性淪為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師生閉門造車、各行其是、互相牴牾的狀態，教師就必須遵循共同的認知框架，訴諸基於相同原理的教學方法與解說步驟，反而更加需要對教案做出費盡心思、鉅細靡遺的事先設計，也要求對學生反應有精細入微的掌控，以致個人在授課與理解上的自由空間，其實不如想像中的寬廣。結論中，朱光潛建議：

設計法全班同進的辦法和道爾頓制根本原理完全相反，當然不能存在；不過我對於道爾頓制還有兩個疑問：一、完全以個人為學習單位，所得的自由是否與所失的公共生活優點相償？二、個別的自由是否定要純以個人為學習單位纔能維持？依我的愚見，個別自由固然要緊，如果因維持個別自由，把公共生活一筆勾消，也不合平民教育的精神。……公共生活的優點在同心協力求實現公共目的的精神；這種精神是人類社會能進化的唯一原素。道爾頓作業室總覺得對於這種精神還有所缺乏。再就兒童心理說，純以個人為學習單位，也不甚妥。兒童都有很強烈的主動同情(Active Sympathy)，發現一種新經驗，一定要有人共歡樂，纔覺快意。不然，他的興會就減煞許多。還有一層，各個人的弱點和能力都往往有所隔；有幾個人在一塊共同研究，彼此可以互相啟發，則事半功倍。就這幾層看起來，我們可以斷定純以個人為學習單位，所得不償所失。¹⁷

¹⁷ 朱光潛，〈在「道爾頓制」中怎樣應用設計教學法〉，收入舒新城，《道

可以看到在中國現實中，設計教學法難以取代班級授課。朱光潛雖然受英式教育，但他顯然並未無條件接受個人自由必然優先的自由主義，而更看重平民教育在實現共同生活協作上的作用。在 1925 年赴英法學習歐陸哲學之前，朱光潛在思考諸如個體自由為智識發展前提與教育宗旨等論述時，已然不太受到通俗權利意識的誘導。也因此，與舒新城不同，朱光潛並不糾纏在個體自由是否為群體現實需要犧牲這點上，而能發高屋建瓴之論，亦即從兒童需要與他人分享心得一例得出：與其說個體自由靠個人智識上的獨立維持，不如說從來只有在共同的價值與情感互動中始有意義。亦如朱光潛後來自承，他在「英國人辦的大學裡學了一點教育學，但主要地還是學了英國語言和文學，以及生物學和心理學這兩門自然科學的一點常識。這就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¹⁸上述兒童具有「主動同情」的論證，仍是以科學，而非倫理闡釋人性的敘事策略，恐怕尚不能真正以共同生活承載的長期合理性，重建現代個體自由的倫理基礎。果然，朱光潛隨即又以學生智力按常態分布為由，試圖以智力相若者的志願結合，消解群體協調妨礙個體自由的疑慮。其潛在假設是：智力相當足以確保個體之間的平等協商，也就不構成對個體自由的侵犯。¹⁹既然個體自由離不開共同生活產生的目的感，又得到智力的保障，自無必要為捍衛自由而堅持純以個人為學習單位。朱光潛由是保留設計教學法，全心擁抱以組織學生為基礎的新設計方案：

所以我主張全班同進的辦法固然不適用，純以個人為學習單位也不妥當；最好每年級學生以天資興趣為準，自由分組，每組以

爾頓制概觀》，第 11 章，頁 182-183。

¹⁸ 朱光潛著，吳福群、錢理群、商金林編訂，《朱光潛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頁 2。

¹⁹ 朱光潛，〈在「道爾頓制」中怎樣應用設計教學法〉，頁 183。

四五人為限。如願每科有每科的分組，或願一組通用各科，都聽學生自便。假使一個學生覺得共組的人不合，也可以再入他組。這樣辦法，對於學生固然有益無害，對於教師就便宜多了。這種分組法實行已久，結果都很好，實際上道爾頓制原也有分組的傾向。²⁰

道爾頓制原是為因應美國師資不足無法分級的現實，分組自習亦是解決老師難以兼顧不同學生進度時不得不然的克難辦法。²¹這種分組被朱光潛賦予了兼顧個體自由與促進共同生活的積極意義。但朱光潛似乎沒有考慮到，他所設想那種基於程度與智力相近標準而結合的學習小組，是否真能自然形成自主。同學之間的意氣相投，未必等於智識程度相當。毋寧說，具有才智、個性、家世等綜合因素的少數人主導團體，可能比不分軒輊的平等結交更接近常態。團體中人即使程度相當，彼此之間照樣會因表達能力、個人魅力與交情種種的差異，難以做到平起平坐、就事論事互相學習，如國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實驗道爾頓制的結果所示，一位初二生指出道爾頓制的缺點是：「精神散漫，團結不固」，「意識不準確，每多偏見」，「頭腦太複雜，易生缺點。」²²其他親歷者還表示，道爾頓制任由學生過早放棄程度不好的主科(如數學)。²³這些看來有些詞不達意的批評，可能反映一些程度平庸學生的心境。他們往往反應較慢，思路不清晰，即使有些見解也是有口難言，在討論時為少數人意見所左右，只得人云亦云。即使

²⁰ 朱光潛，〈在「道爾頓制」中怎樣應用設計教學法〉，頁184。

²¹ Piet van der Ploeg, *Dalton Plan: Origins and Theory of Dalton Education* (Deventer: Saxion Dal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6–128.

²² 廖世承編，《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頁144。

²³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頁18。

全心擁抱道爾頓制的舒新城，也承認在英國女中的案例中，遲鈍學生有過於依賴聰慧者的情形。²⁴若要避免，教師就必須干涉分組，這樣做不僅在實務上難以做到，還根本違反志願結合的原則，使教師設計的角色進一步加強，也進一步壓縮學生的自主性。雖然朱光潛反對恢復以班級為單位的傳統授課法，但採取班級與個人之間的四五人小組為學習單位，是否就能確保學生的自主性，仍是一個有待證實的問題。

可以看出，青年自主的能力是舒新城、朱光潛等人的根本關切，道爾頓制不過是這一理想提供的最新名目而已。如學者指出，「道爾頓制」一詞雖出現於 1920 年，但更早之前，帕克赫斯特為了擺脫此一教學法本身的克難性質，就已有意識地採集十九世紀各派人文主義教育理念，以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義大利教育學家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等人諸如民主教育、尊重兒童天性的學說，雜揉而納為己用，至於這些主張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衝突，對一心妝點道爾頓制理論性的帕氏而言，自是無暇顧及。²⁵道爾頓制在西方一時蔚然成風，也是因為其論述迎合了各國進步派知識人對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西方現代人文主義教育之父)理念的想像。裴斯泰洛齊人文主義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尊重學童天性，這一理念構成西方近代學校教育的基石，也為杜威、蒙特梭利等教育改革家所推崇，雖然人們對如何實踐尊重天性，彼此存在極為不同的理解。就裴斯泰洛齊而言，在他所處的啟蒙與法國大革命時代，所謂尊重天性，往往意味以教育手段改造天性臻至完善。而德國青年運動領袖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 1932 年對裴斯泰洛齊學校的一段追慕性文字，則是如此呈現：

24 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頁 160。

25 Piet van der Ploeg, *Dalton Plan*, 128–129.

「上課時，學生經常可以走來走去、自由進出教室、一會兒站、一會兒坐，有時以為他們要形成一個小組了，卻馬上解散了。不少來訪者對這種狀態感到驚奇。」有個報告中寫道：幾種完全不同課程卻在同一個教室裡上課也是並不稀奇的事情。許多小組擁擠在一個大廳裡複習，像蜜蜂一樣發出嗡嗡、嗡嗡的雜訊。²⁶這段文字，與其說是班雅明用二十世紀初道爾頓制的場景描述十九世紀初的情形，毋寧說是在西方知識人眼中，道爾頓制簡直就是十九世紀教育理想的復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身為青年運動領導者的班雅明，對裴斯泰洛齊自由人文主義教育理念的兩面性已然有所洞察：

裴斯泰洛齊的氣質有種難以預測的衝動、宛如閃電那樣溫柔的眼光。他的眼睛有時像明星那樣閃現，照亮四周，卻又隱蔽了他在窺視學生們難以瞭解的內心。那以後他又會突然因為生氣而長時間保持沉默。²⁷

也就是說，在自由分組研究寬鬆隨性的表象之下，裴斯泰洛齊時不時發起如閃電一般嚴厲，企圖劈開學生內心以窺探規訓的強烈衝動。也許正因如此，班雅明對自由研究與道爾頓制仍然寄予厚望。雖然，學者朱光潛的認識與班雅明也有共通之處，他們從未拘泥於道爾頓制的實質或定義，也對可能的政治後果未及深思，而更在意自由人文主義理想的實現。

在此共同的時代背景下，朱光潛起而力行。在 1924 年的〈私人創校計畫〉中，他批評當時中國「一個普通中學課程往往比歐美尋常

26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伊凡爾登的裴斯泰洛齊〉，收入徐維東譯，《本雅明論教育：兒童·青春·教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頁 138-139

27 本雅明著，〈伊凡爾登的裴斯泰洛齊〉，收入徐維東譯，《本雅明論教育：兒童·青春·教育》，頁 139。

大學還要完備」，²⁸只知盲目照搬西學體系，強迫學生吸收大量脫離實用的抽象科普知識，完全沒有顧及發展青年的「天才」與「特長」。²⁹朱光潛的解方是放棄正規學制。1925年初，他在包括孫中山(1865–1925)等一千國民黨要人聲援下，與朋友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以培育中學青年為目的。在這所發揚柏拉圖學園自由討論精神的學校中：³⁰

全取自學輔導主義。廢除班級制。學生讀書所取方向和速度，完全以個人資稟興趣為準。除國文及基本科學知識為人人所必修外，須考察每人個性，看他的天才偏重何方，使其儘量發展。對於學問，吸收與發表並重，吸收注重歸納方法。寧可在一部分專心致志，因而發生濃厚的興趣，向各方面伸張；不可最初就注入一些模糊隱約的綱要，使個個問題都若即若離的講到，而沒有一個問題懂得透徹。……至於發表則注重辯論演講。我們應規定每人每日至少有一小時的辯論或演講。古代希臘和我國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所以特盛，就因為人人歡喜辯論。辯論的好處在發見己見的錯誤，和旁人的新見解，因而批評入微，達於真理。³¹

既然否定了正規中學全面而「模糊隱約的綱要」式的照單全收，朱光潛所寄望於道爾頓制者，正在以自主學習與辯論解放思想，從而發現學生先天具有的一偏之才。必須指出，朱光潛對非正規、不全面「天才」的重視，自不是對科學普遍性的否定。從他依然將科學列為必修可知，朱光潛只是質疑西式中學建制知識的有效性，而試圖以事實歸

28 朱光潛，〈私人創校計畫〉，收入吳福群、錢理群、商金林編訂，《朱光潛自傳》，頁28。

29 朱光潛，〈私人創校計畫〉，收入吳福群、錢理群、商金林編訂，《朱光潛自傳》，頁28。

30 朱光潛，《朱光潛自傳》，頁43。

31 朱光潛，〈私人創校計畫〉，收入吳福群、錢理群、商金林編訂，《朱光潛自傳》，頁34。

納，而非抽象演繹得來的「真科學」，逕付青年自主認證。這些主張，卻與中華大學附屬中學教師惲代英 1920 年在《中華教育界》上的倡議若合符節，或者朱光潛讀過惲代英的文章。³²這反映當時知識界一方面對抽象推論普遍不滿，一方面仍然乞靈於想像中的西方教育理念。至於他對辯論的提倡，除了列出一些高度簡化的歷史文化依據，主要承襲自香港大學的辯論風氣。³³同樣深受基督教團契文化與英美教育傳統影響的復旦大學，在五四以前即有辯論的訓練。³⁴這種在小組中進行的口頭論理活動，青年非常歡迎，也是他們投身革命活動的重要積澱與誘因。我們再次發現，無論是不是用道爾頓制或設計教學法的名義，朱光潛等人真正追求的皆是一套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乃至更早的歐式人文主義教育。他們的教育理念背後又蘊涵著對西方民主的美好想像與追求。1928 年，張孟聞(筆名西屏，1903–1993)還對魯迅嘲諷道：「對於空洞的學說信仰，若德謨克拉西、道爾頓制，……等，此等信徒，猶是市場偶像信徒之上上者。」³⁵可見道爾頓制寄託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民主訴求，已不僅是教育界內的小眾現象。

類似道爾頓制與小組的實踐並不局限於沿海大都市中，很快即向江、浙、湘、鄂各中小城市蔓延開來，1924 年即有 100 所學校試行。³⁶

³² 惲代英，〈編輯中學教科書的先決問題〉，收入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第 4 卷，頁 190。

³³ 朱光潛，〈回憶二十五年的香港大學〉，收入吳福群、錢理群、商金林編訂，《朱光潛自傳》，頁 12。

³⁴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頁 370。

³⁵ 張孟聞，〈偶像與奴才〉(白露之什第六)，收入魯迅，《魯迅全集》，第 8 卷，〈通信(復張孟聞)〉，頁 264。感謝審閱者提供此條材料。

³⁶ 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頁 219。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頁 104。

及至 1930 年代初，在河南開封，還是小學生的柏楊(郭定生，1920–2008)即接受過道爾頓制的教學。當時開封並不發達，城市規模有限且風氣閉塞，道爾頓制卻下沉到了小學。該制流行之廣，可見一斑。整體而言，由於陳義過高脫離現實，道爾頓制無法取代班級教學法，大致在 1926 年後漸趨沉寂。³⁷但是小組討論等實踐卻在課外活動中保留下來。由於傳統社會的權力結構與秩序尚未瓦解，加上對現代意識形態鬥爭十分陌生，各地方大大小小的軍紳政權，雖未必受法令制度約束，也難以無視根深蒂固的人情關係。這就使大多數內地社會，因為自身資訊的滯後，以及缺乏帝國主義者的配合指導，例如英國巡捕提供的情報與審訊支援，在鎮壓革命一事上往往徒具形式，遠不及上海之類口岸城市嚴厲。於是，對那些在 1925 年五卅運動後才迅速投入革命洪流的青年而言，革命不過是日常生活的點綴。當時一位濟南女中學生的日記中，可以窺見國民革命初期的實態。

1925 年 11 月 20 日，濟南女中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謝懷丹(本名裘東莞，1908–1992)，與濟南幾個學校支部代表開會。會議內容是各書記工作與個人報告，涉及實際工作不多，主要是成員之間的心得分享與互相批評。會中同志對她的批評是：「話較多，但發慌、口齒不清、不能充分發表意見、態度不從容。」³⁸會後她自問自答：

怎樣可使工作進步？多讀書(革命書籍)，多閱刊物(革命刊物)，多閱報，多作文，多參加會，多接近同志，多練習口才，多對內談話，多宣傳，多通信(與發展對象通信)。³⁹

37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頁 18。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頁 104。

38 謝懷丹，《歲月展痕：一個莫斯科中山大學女生的回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頁 12。

39 謝懷丹，《歲月展痕》，頁 11–12。

可以看出，在她當時的理解中，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以口頭或文字宣傳進步思想，發展更多人參加革命，所以她和同志們皆將表達能力的加強視為頭等大事，口才能在更多宣傳與會議場面中派上用場，自是重中之重。會後隔日，謝懷丹立刻著手「使工作進步」，列出八項共青團工作，一項是與同學通信發展團員，一項是「對內談話」，就是與自己的好友，也是發展她入團的秦曼雲(1908-2001)談所謂工作。其它六項全是閱讀各類書報與寫下簡短心得，其中有進步書刊如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也包括日本短篇小說。⁴⁰

看似一切如常，某些時代的新事物卻悄然發生。工作內容中平平無奇的「對內談話」，其中卻醞釀著一種真正具有顛覆性的政治實踐。謝懷丹在 12 月 22 日如此寫道：

對內之訓練，星期一招棠談話、星期三招芳談話。未談之前要有充分的準備。談話內容：①觀察對主義(共產主義)之認識；②思想方面(思想情況)，③對工作是否努力？④其行動如何？⁴¹

顯而易見，這個不滿十八歲的少女心中，開始有了政治工作者的自覺。她雖然還沒有經歷真正嚴酷的考驗，卻已經對掌握同志思想狀況，發揮幹部領導作用的基本原則有了初步認識。至於她在談話前要做何種「充分的準備」？只能推測那是一些窺測與引導對方內心想法的談話技巧。這種意識與技術的一個可能來源，應該是 1924 年 10 月 11 日，《中國青年》上惲代英的〈學生運動〉一文：

我們亦可以與同學組織日記會，演說會，辯論會，旅行隊，讀書會等等。這在一方可以因為這種組織，與有些同學發生多一層的關係；一方(面)亦可藉此引誘同學與我們的思想相接近。在輪流

⁴⁰ 謝懷丹，《歲月履痕》，頁 12-13。

⁴¹ 謝懷丹，《歲月履痕》，頁 15。

閱看日記或讀書錄的時候，在輪著我們報告演說辯論的時候，在我們與他們自由談話的時候，我們可以常酌量情形發表些我們的意思，使他們於不知不覺間受著影響。我們在不合宜的時候，不要說出什麼主義，什麼黨，亦不要說些過於駭人聽聞的言辭。我們要把主義的實質，就各種日常問題指示出來，使聽的人容易而且樂於承受。⁴²

此時惲代英正在國共合作的上海大學任教，致力於在學生中發展國共兩黨黨員，但他這些做法並非思想左傾以後才發展出來，而是總結自多年學生運動的經驗。甚至早在五四前，在惲代英的教會大學學生生活中，就已充滿這類與友朋談話的記載，很難說這些社交活動是特定傳統的產物。但對謝懷丹一輩來說，《中國青年》等本國進步書刊，無疑是他們獲取「對內談話」等技術的最主要來源。無論淵源為何，謝懷丹這樣出身落魄師爺家的女兒，能夠將對內談話做為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說明相關的論述與知識流傳頗廣。但她所能想像與嘗試的政治技術，實際上很難超越分享學習心得與個人體會的層次。在此情形下，當她晚年回憶於 1927 年初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上課的最初體驗時，據其描述，彷彿蘇聯正是按照教師演講、學生自主研究，然後共同討論的流程培養革命幹部。⁴³另一位留俄學生盛岳(盛忠亮，1907–2007，後來成為秦曼雲之夫)在美國出版的相關回憶錄有詳細的分析與反思：

中山大學學生們對上述教學法都有極深刻的印象，他們感到這種方法比通常的講課方法更能激勵上進，更著成效。就我個人而言，這種方法似乎對我有幾項好處。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它不是強調死記硬背，而是鼓勵思考。第二，學生必須主動而不是被動。他們必須從大綱中選出自己的專題和參考資料；他還要對

42 惲代英，〈學生運動〉，收入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第 6 卷，頁 512。

43 謝懷丹，《歲月履痕》，頁 28–29。

他所讀的著作進行分析批判和提出問題。第三，學生從相互討論中獲益非淺。他開始了解原來他沒有想到的問題，並用新眼光去看舊結論。第四，強調每天做作業和課堂口試，這樣來取代正式考試，可以真實地衡量學生的成績。第五，學習就像戰鬥。人們提出論點就像在戰場上向前衝鋒。就算這個學生被打敗了，他也學了在逆境中堅持。他還學會了勇於承認失敗和尊重大多數人的意志。⁴⁴

當時莫斯科也實施道爾頓制，⁴⁵其最初意圖在以道爾頓制削弱高等教育的教師影響力，因為這些教授多半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中產階級。為此，蘇聯道爾頓制強調分組作業，由學生選出的小組長與教授商討學習計畫與進度。小組長還負責撰寫整組學習報告，而不再保留個人學習紀錄。這些舉措皆使學生，特別是小組長的權力大為提高，教授僅供諮詢之用。顯然對當時蘇聯革命者而言，道爾頓制及其民主論述雖然皆源自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但與列寧主義嚴密的組織原則不僅不相衝突，實則相得益彰，下文亦將看到，直到1920年代列寧主義自身仍處於發展完善之中，未可將之簡化為絕對服從黨意的統治術。在此

⁴⁴ 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92-93。

⁴⁵ 據道爾頓制的設計者帕克·赫斯特女士所云：1925年之前，莫斯科已採用此制為官方教學法。Guy M. Whipple ed., *Adapting the Schools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Twenty-Fourth Yearbook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art II* (Bloomington: Public School Publishing Company, 1925), 83. 蘇聯小說中有提及1923-1924年在學校實行的情況，可以參考Nikolai Ognev, *The Diary of a Communist Schoolboy*,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Alexander Werth (New York: Payson & Clarke Limited, 1928), 16. 此英文版後由林語堂譯為中文，於1929年以《新俄學生日記》為題，由魯迅支持的春潮書局於上海刊行。

不能排除盛岳、謝懷丹的描述反映某些客觀體驗。⁴⁶盛岳對小組討論尤其給予高度評價：

我們所有的黨、團員，每週參加共產黨的小組會，……通常我們每個小組有二十人到二十五人，有一名指導員主持。在中共莫斯科支部被撤銷後，一直由俄國人任指導員。在小組會上我們可以暢所欲言，或者慎重思考。可是，要求每個人都對討論的問題發表意見。誰都不能保持沉默。如果有人不發言，就要被指導員點名發言。當然，對小組會和班會上這種做法的用意之一，是想保證做到人人都信奉令人滿意的觀點，清理掉一些越軌思想。而這種做法的另一用意，是要培養我們獨立表達意見的能力。這種辦法在上述兩方面都很有效，連半文盲的工人通過反覆被逼這麼做，也學會了公開發表自己意見的本事。⁴⁷

所謂「令人滿意的觀點」，或「越軌思想」，可以來自自己的分析批判，即所謂自由研究，但所謂令「人」之人，恐怕更多指的是其他組員，特別是俄國指導員。盛岳提供的樂觀陳述沒有說明的是：若不能令其他人滿意，個人是否仍該根據自己的分析批判「暢所欲言」，「在逆境中堅持」。按照盛岳的說法，爭論顯然受到鼓勵，爭執不下再由俄國教師與指導員裁決。可以說，中山大學也偏向設計教學法。暢所欲言或自由研究，只是實現正確觀點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這一原則在普通教育與政治教育中皆站得住腳。另外盛岳還指出，這套教學法並不要求學員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只要在小組會上多次練習，半文盲的工人，或許不需要獨立思考，也可以掌握「獨立表達意見的能力」。

46 Alexander Sorokin & Sakharova Elena, "Dalton-Plan in the Context of Reforms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in Soviet Higher Education in 1920–1930s," *The Anthropologist* 23:1/2 (2016): 121–123.

47 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頁93。

這種獨立表達共同觀點的訓練，似乎也不能說是對教育本質的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盛岳提及：由俄國人擔任小組指導員，是在中共莫斯科支部，也就是中共旅莫支部撤銷之後。說明此前的作法並非如此。這一改變與中共黨史上圍繞旅莫支部發生的著名爭議有關。以下我們不妨就從旅莫支部爭議談起，說明何以旅莫支部的取消，會導致小組實踐方式的轉變。

三、旅莫支部紛爭的實質

中共旅莫支部建立於 1921 年底，最初並不隸屬於蘇共，而是在莫斯科獨立運作的一個中共海外分支。這是因為蘇共缺乏足夠通曉中文的幹部，而多數留蘇中國學生也不通俄語，為滿足領導、溝通與教育中國留蘇學生的實際需要，於是在蘇共的支持下，商請中共協助成立。此後，在協助教育管理中國留蘇學生方面，旅莫支部就是兩國共產黨所能倚靠幾乎唯一的機構。在其存在的近五年中，旅莫支部也確實在黨員教育訓練與管理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其成員回國後，對於中共早期組織建設更是功不可沒。⁴⁸

回顧旅莫支部的相關研究文獻，幾乎都要提起它與中國留蘇學生之間的衝突，進而從政治鬥爭的角度出發，關注中國留蘇學生行為的政治動機，以及他們遭遇的多次政治鬥爭，乃至迫害，或將之歸因於少數旅莫支部領導人的權力野心，或探究其中涉及的中共黨內鬥爭與

⁴⁸ 張澤宇，〈莫斯科東方大學旅莫支部述論〉，《廣東社會科學》，2011：4(廣州，2011)，頁 24–30。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的幹部訓練(1921–1926)〉，頁 108–118。孫會修，〈旅莫支部歸國幹部與大革命期間中共組織制度的改造〉，《中共黨史研究》，2015：5(北京，2015)，頁 10–20。

中蘇矛盾。⁴⁹例如，引領學生反對旅莫支部的王明(陳紹禹，1904–1974)，因為日後與毛澤東(1893–1976)的恩怨，被描述成為了換取個人權位，而迎合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迫害其他中國學生的惡毒小人。⁵⁰這樣的討論確然有事實根據。不過除此之外，採取理解早期中共軌跡與青年政治關係的角度來解釋某些結構性的歷史問題，無疑是個值得開展的嘗試。如余敏玲的研究轉換了政治鬥爭的視角，分析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經驗與蘇聯國際主義的關係，指出理想與策略性的國際主義兩者，皆在蘇聯幹部的政治實踐中留下深刻印記，從而對許多政治事件的性質提出了更具說服力的解釋。⁵¹循此一開創性路徑，可以說青年

⁴⁹ 楊奎松，〈「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3(北京：1994)，頁193–219；楊奎松，〈「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續)〉，《近代史研究》，1994：4(北京：1994)，頁213–241。李永昌，〈關於「江浙同鄉會事件」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04：5(北京，2004)，頁81–87。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清除小資產階級思想運動與幹部教育(1921–1926)〉，《史學月刊》，2022：2(開封，2022)，頁66–79。孫會修，〈旅莫支部成員的入黨之路與中共早期組織建設〉，《歷史研究》，2021：4(北京，2021)，頁114–138、222–223。孫會修，〈「發表力」的養成：中國共產黨早期留蘇學生的談話訓練〉，《近代史研究》，2021：3(北京，2021)，頁59–76、160。孫會修，〈組織熔鑄與個人努力：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長〉，《黨的文獻》，2018：6(北京，2018)，頁112–121。

⁵⁰ 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劉明鋼，〈王明「左」傾宗派集團與莫斯科中山大學〉，《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武漢，2007)，頁10–13。周憑欄、周冰洋、周太和，〈館藏檔案揭開莫斯科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事件歷史面紗〉，《黨史博覽》，2023：3(鄭州，2023)，頁70–72。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史縱橫》，1989：1(瀋陽，1989)，頁38–39。陳斌，〈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陳訓明，〈周達文同王明宗派主義的鬥爭〉，《貴州社會科學》，2008：11(貴陽，2008)，頁96–101。

⁵¹ 余敏玲，〈國際主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中央研究院近代

政治也富於國際主義的色彩，同樣具有理想與策略兩重面相，或可為旅莫支部，乃至中國留蘇學生政治走向提出新的詮釋。

旅莫支部的首任書記是羅亦農(又名羅覺，1902–1928)。這位出身湖南農家，文化程度不高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與劉少奇(1898–1969)、任弼時(1904–1950)等日後中共領導人一起，於1921年10月成為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或東大)的第一批36名中國學生入校學習。⁵²羅亦農有語言天分，入學後不久，就能流利使用俄語。在大多數蘇聯教員不懂漢語，其他中國同學尚未進入俄語門徑的時候，羅亦農自然成為學生與校方之間的溝通渠道，直到1925年回國前，一直擔任旅莫支部書記要職。幾乎同時，同樣擔任過東大教學翻譯的瞿秋白(1899–1935)，也因為俄語才能，不久即獲拔擢為中共中央委員。可見語言能力是在早期中共黨內發展極為重要的政治資本，旅莫支部書記的通譯職能，實際上使這個崗位，具有遠大於其表面權責的政治地位。然而羅一農這位有語言天分的青年領袖，據說在旅莫支部創立了一個「惡劣」傳統，就是不重俄文與理論學習，卻強調服從組織紀律，尤其注重對成員日常言行進行嚴格的審查與批評。也是首批留蘇生的抱朴(秦滌清，1901–1988後)，1927年出版了《赤俄遊記》，可能是概述旅莫支部內情最早的中文材料。抱朴是被旅莫支部開除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旅莫支部的看法極為負面。但參酌其他史料可知，他的描述大致符合事實：

五位執行委員正想用更嚴厲的組織，箝制團體員的自由。但此時大家已深惡委員會的專制，均主張推翻委員制度。開會後，雙方

史研究所集刊》，26(臺北，1996)，頁249–253。方一戈，〈青年蔣經國與「江浙同鄉會」冤案〉，《文史春秋》，2003：2(南寧，2003)，頁29–31。

⁵²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中共早期留蘇檔案解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頁11。

爭論極烈。委員派僅六七人，其餘的都是反對派。反對派極力指摘委員會的罪惡，他們檢查團員的信札，但自己卻寫祕密信，如秀松曾寫信給張太雷，說他與羅覺等四人為團體的「中堅分子」。但委員派似乎說，沒有他們來管束，恐大家不肯用功念書。但這種薄弱的理由，終不能使大家滿意。蔣光赤忽然跑到台前，把他們痛罵一頓。他說：「我們反對執行委員會，並不是人的問題，實是制度的問題。現在一般人要打倒資本家，而自己代替他們的地位。」為人與羅覺等則說：「委員制度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法，如反對委員會，便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大家並不畏懼這種恫嚇。⁵³

此處執行委員會就是旅莫支部，這場推翻支部的會議，最後因為委員派（一般也稱黨務派）訴諸俄校方權威而遭壓制。黨務派的管制確實相當嚴厲，甚至檢查私人信件，早已經觸犯眾怒，支部內還存在由羅亦農、俞秀松（1899-1939）等四名「中堅分子」組成的秘密團體，更令不願被秘密控制的學生忍無可忍。其實這個團體不過是支部內黨組的領導核心，說明旅莫支部是按照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運作，由書記與少數幹部組成的核心控制整個支部，本屬常規操作。中國學生遠赴莫斯科，不正是要學習先進的革命方法嗎？從多數學生的反應看來，個人自由還是他們心中最看重的。這種立場，確實如羅亦農指出，根本違背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1924年8月5日，羅亦農在旅莫支部第三次大會的報告中批評同志：

目前普遍的壞現象——意志不一，有些團員有意見不肯發表。
團員與執行委員會的人，沒有很密切的關係。沒有一定的人生

⁵³ 抱朴，《赤俄遊記》（上海：北新書局，1927），頁23-24。

觀，因此有許多團員受訓練近於敷衍和機械，互相批評的態度不好。⁵⁴

考慮到東大最初並非只招收中國共產黨員，大多數學生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只能算是廣義社會主義的同情者，留蘇學生的思想與立場可謂莫衷一是，其中既有蔣光赤(又名蔣光慈，1901-1931)這樣的「少年漂泊者」(他日後的成名小說)，還有抱朴這樣不改初衷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身負發展黨員責任的書記來說，謀求一定的人生觀，不僅是接受蘇聯政治訓練的目的，也是中共自身的必然要求。根據 1924 年 8 月 5 日在支部大會上的報告，羅亦農對訓練的強調，並不違背列寧主義經典的組織原則：

小組組長對於該組組員，須絕對執行紀律之責。執行委員不一定參加小組會議，但是執行委員會每禮拜須召集小組組長會議一次，小組組長報告各組一禮拜經過的情形。執行委員會應為[於]必要時，得召集比較明瞭比較積極作工的同志開會。每個團員至少須與兩個團員以上的團員發生極密切的關係。⁵⁵

執行(即支部)委員，或者中堅分子組成的小組，就是領導整個支部的核心黨組，黨組的小組長自然是支部書記。同時支部中其他成員也要組成自己的小組，所謂必須與兩個團員以上發生密切關係，意味小組的最小規模是三人，每週開一次小組會議。在 1924 年前東大可能有五個小組，每組五到七人。⁵⁶黨組同樣每週召集一次全體小組長的會

54 羅亦農，〈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二四年八月五日)〉，收入《羅亦農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2。

55 羅亦農，〈在中共旅莫支部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二四年八月五日)〉，收入《羅亦農文集》，頁 3。

56 彭述之著，程映湘、高達樂(Clande Cadart)編撰，《彭述之回憶錄(上卷：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頁 262。

議，以掌握各組情形。此外支部委員又可以做為上級指導，參與或干預各小組。整體看下來，羅亦農的訓練計畫完全符合當時蘇共的制度，包括由黨指派小組以外的指導員指導小組工作一點，也是蘇聯普遍採用的做法。⁵⁷

陳碧蘭(1902-1987)於1924年10月進入東大。包括她在內，許多中國青年一接觸到旅莫支部的小組會議，立刻感到欲罷不能，甚至不惜犧牲睡眠健康，也要「天還沒有大亮就起來，在沒有燈光和陽光半明半暗的情形下，偷偷地開小組會，討論各種問題」。⁵⁸其中自然有對革命理論(屬於抽象普遍話語)的求知若渴。然而隨著訓練的持續，許多人開始對頻繁的小組會感到厭煩。陳碧蘭回憶：

我當時深深地感覺到：旅莫支部領導層同志，對黨員和團員的教育從各方加緊進行，確實加速提高了同志們的理論水準；同時，實行嚴格的批評制度，而這種批評，不但在各小組會裡進行，於必要時還在全體大會上進行。但不管開全體會議進行批評與否，中國旅莫支部的執行委員會每月必須集合各小組的相互批評，製成一幅批判圖案，每一成員均站一塊地位。寫成之後，就把它以圖釘釘在人人必須經過的宿舍寬大的走廊的牆壁上，等於一月一次的判決詞。同志們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情，去閱讀自己的或別人的判決詞。那些曾經受過批評的同志，當然是懷著提心吊膽的心情；但那些曾經獲得好評的分子，他們是懷著一顆自信和愉快的心去欣賞自己榮譽的稱許和鼓勵的詞句的。⁵⁹

陳碧蘭旅莫期間是羅亦農的女友，之後成為她丈夫的彭述之(1895-1983)

57 孫會修，〈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小組指導員問題研究〉，頁112。

58 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56。

59 陳碧蘭，《我的回憶》，頁63。

則是旅莫支部的二把手，陳碧蘭因此對羅、彭二人之事有所避諱。但從以上引文還是可以感覺，旅莫支部的訓練方式很快發展成對個人的嚴厲批評，乃至批鬥，無疑是對受訓者的強大壓迫，也引發人際之間的緊張。陳碧蘭還指出：

此外，使我深深感覺到的是當時黨和團對同志課外的教育方法有些浪費精力和機械。例如把許多的時間消耗於個別的談話中。執委決定每一個同志每星期必須有一張報告表給其所屬小組書記，上面必須填寫同幾個同志談話的名字和內容。因此，弄得大家很不自然地硬去找人談話，來報銷這一個星期的工作。為了報銷工作而談話，那麼這種談話必然產生敷衍和虛偽的弊病。至於談話的內容，第一次多半是相互報告自己的歷史，以便彼此容易瞭解，我覺得這倒有相當的意義和必要。因為要想深刻地瞭解一個同志，必須首先知道他或她的出身、環境以及其重要的思想發展和歷史過程，但時間愈久，談話的題材便感缺乏，只好硬找一些題材來談，這就有點浪費時間和精力了。而且我們空餘的時間很少，因此大家都是利用從宿舍到學校，或從學校到飯堂沿途走路的短暫時間來談談，彼此心裡都明白這是為了填報告表的。⁶⁰

這就是前面謝懷丹所說的「對內談話」。陳碧蘭所揭露敷衍了事的情形，有助學者對檔案中呈現的組訓成效持謹慎態度。但小組在蒐集敵我思想情報，規訓成員言行，強化上級管控與協調組織行動方面的預設功能，卻也不能抹煞。1923年，留學早稻田的北京平民大學教授林可彝(1892-1928)來到東大學習。為了摸清此人虛實，旅莫支部將平日訓練用於實戰。留法的鄭超麟(1901-1998)於稍早進入東大，對學習俄文與理論有濃厚興趣的他，雖極不適應旅莫支部的訓練，也在支部二把手

⁶⁰ 陳碧蘭，《我的回憶》，頁64。

彭述之的組織下，參與了這次集體政治談話行動：

彭述之說：「林可彝是大學教授，在國內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而我們是些無名小卒，他會看不起我們，應當用集體的力量去征服他。」於是分派了職務，例如哪幾個人同他談話，談什麼話之類。……我的使命是同他談唯物史觀問題，看他在這方面知道了什麼，……有個同志從我的房間調開，騰出一張空床給他。……我以同鄉的資格招待了他。同房間的人同他說「今天天氣……」一類的話，我則有時將話題引到理論上去。談了幾次的話，我發現，關於唯物史觀，他是一無所知的，至於經濟學或其他學問則另外有人去做結論。⁶¹

鄭超麟被同學謔稱為 professor(教授)，⁶²有些書生氣，不擅長也不喜歡政治實務，在他看來，彭述之其實也是同樣笨拙的書呆子，⁶³但經過支部的培訓，他們顯然皆掌握了一些與人談話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能夠與其他同志集體協作，便能於短時間內摸清對方的政治面貌與思想水平。這應該是羅、彭二人平日言傳身教蘇共政治談話技術的結果。⁶⁴

不妨再來看另一位黨務派幹部趙世炎的見解。出身法國勤工儉學的趙世炎(1901–1927)在旅莫支部中負責組織訓練工作。他在 1923 年 4 月 28 日支部會議上發言：

就個人感覺，在這樣團體中，個人應加以深刻的反省，我於述之、羅覺外，尚有補足，來源已說明白，但就青年中天性講，如經嚴格批評，往往面紅耳赤，至不能受，一、二次破臉，尚不要緊，事實當前，靠不住了。因為訓練尤其要緊，又能說行亦要注

61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頁 197。

62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頁 194。

63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頁 194。

64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頁 406。

意。今天曾和他同志談話，以為如果沒有這樣無產階級的國家，大家亡命在外，必定更為親密。現既有這樣國家，好好生活，研究主義，這樣好環境中，應有很好的訓練，歐洲黨中分子，無非有點不滿意，各逞己意，自為發明，終至召[遭]分裂的現象，這都是訓練不嚴的緣故。⁶⁵

趙世炎已經看出，黨務派與反對派的根本矛盾，其實是對「青年天性」的規訓問題。他特別提醒眾人，若不是蘇聯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眾人在流亡中恐怕根本無暇開意見與爭自由。亦即無產階級國家的環境，反而為青年習氣的滋生提供條件。除了有形的物質條件，無形的政治技術，如引文中所舉的互相批評，亦不斷在激起面紅耳赤的爭辯中，鞏固了青年所謂「同志中大約都有一點自大，太尊重個人自由的色彩」。⁶⁶然而，為了克服這些青年天性，加緊訓練的結果，一方面招來反彈，另一方面，其實如抱朴的情形，又助長了「各逞己意，自為發明」，「終至……分裂的現象」。換言之，列寧主義組織原則不能簡單視為對青年天性的壓制，而應理解為借用青年天性克制青年的特殊機制。要做到這種矛盾的對立統一並非易事，還在探索中的趙世炎，一時只能提出「規定讀書方法」與「規定研究事實問題」的建議，約略指向了規訓自由研究的方向。趙世炎在日後革命中以幹練著稱，但從此時發言已可看出，他思路清晰，重視實際也不反對理論學習。一個月後，趙世炎將他的思考化為〈旅俄中國 C.P.(共產黨)組青年團訓練部綱要〉，提出了「具體化」、「秩序化」、「系統化」的原則。⁶⁷不

65 趙世炎，〈在中共旅莫支部會議上的報告和發言(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入《趙世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556。

66 趙世炎，〈在中共旅莫支部會議上的報告和發言(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55。

67 趙世炎，〈旅俄中國 C.P.(共產黨)組青年團訓練部綱要(一九二三年五月三

出意外，趙世炎提出了小組：

而各小組的意義專在相互的訓練。黨員，候補黨員，或執行委員，全是小組中的組員。黨員，候補黨員或執行委員在小組中沒有特殊的地位，然而訓練的意義卻因此看重：無論在理論方面或行為方面，我們當要看看前進於共產主義者是怎樣檢點了自己並引導了別人……⁶⁸

此處的小組，與前述羅亦農一年後報告中的型態略有不同。在羅亦農的方案中，執行委員做為支部領導，居於指導地位，而趙世炎則強調成員地位平等，所有人皆要受訓練，為他人檢視。這或許說明在 1923 年中，也就是抱朴事件前後，旅莫支部的權威，還未獲得成員充分承認。也可能只是訓練初期的辦法。緊接著是小組中的具體活動：

本團的報告有兩種：一種是書記部或各種研究會的工作；一是團員向檢察部每週的報告。前者的內容是多種的；或屬於理論，或切於時事；或關於問題。報告之後有討論，或辯論，或質疑。在本團大會中，使團員多受會場的訓練，及增添知識的材料。後者是恒常的工作，由執行委員會規劃，由監察部執行之。批評會在過去的事實上，大家感覺許多興味與益處，這誠是我們團體歷來最有意義的工作。這個工作我們只有繼續不懈。本團的檢察部是擔任此工作之報告者，但材料的聚集，得之於各小組，批評的決定則在執行委員會。批評會於大會中舉行，每月一次。我們的瞭解本在平時，然而考核平時的瞭解者就是批評會。我們沒有因批評而生畏懼之心，又絕不因批評而吝於改過。同志之間，我們朝夕相處，赤裸裸的表出思想與性情，披肝瀝膽地吐所欲言。我們

十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58。

⁶⁸ 趙世炎，〈旅俄中國 C.P.(共產黨)組青年團訓練部綱要(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60。

要從人的瞭解，做到同志的瞭解，從日居月處同學朋友，做到生死相與的革命兄弟！⁶⁹

第一種報告顯然主要為了滿足青年理論學習與抽象論理的需要，以辯論方式進行。第二種報告，則是旅莫支部日後最為人詬病的互相批評，是訓練的重點所在。綜合前引材料，青年對此種批評會可謂愛恨交織。支部對此種矛盾心理似乎知之甚詳，明白只要調控得當，就能使青年欲罷不能，還能藉機堂而皇之蒐集成員材料，摸清每個人的政治面貌與長短。一種建立在鼓勵、利用個人坦白的政治技術路線，已然在青年欲拒還迎之際漸漸成形。近期學者使用旅莫支部檔案，呈現了這種訓練的諸多細節，例如將優秀、中平、落後三等人混合編組，促使他們互相借鑒競爭，還假設多數成員為政治上的「中立分子」，小組長要加強與他們談話，「面對『聰明而狡猾』的同志時，更要多與之談話，以達到訓練目的」。⁷⁰

隨著旅莫支部第一代領導人羅亦農、彭述之、趙世炎陸續回國工作，以及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中文通稱為莫斯科中山大學，以下簡稱孫大)在 1925 年底的成立，中國學生轉為集中於孫大，旅莫支部的重心也從東大轉移到孫大。孫大成立後，旅莫支部的書記是留法勤工儉學的任卓宣(筆名葉青，1896–1990)。⁷¹根據任卓宣日後的說法，他基本上遵照羅亦農、趙世炎的辦法主持支部工作。⁷²流行的說法將任卓宣任內描寫為一個恐怖時期。然而蔣經國(1910–1988)寫於 1937 年的部分回憶，似

69 趙世炎，〈旅俄中國 C. P.(共產黨)組青年團訓練部綱要(一九二三年五月三十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60–561。

70 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的幹部訓練(1921–1926)〉，頁 112–113。

71 任卓宣，〈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收入中華民國留俄同學會，中華文化基金會編，《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踣厲》(臺北：中華文化基金會，1988)，頁 74。

72 任卓宣，〈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頁 76。

乎更貼近當時一般孫大學生的觀感：

在中山大學，有部分國民黨黨員學生，因為行為不端，頗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時覺得共產黨員行為比較檢點，作為也較有出息。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有個支部，其組織和訓練方法都相當健全有序。它的黨員組織嚴密，並受到嚴格監督，而且永遠遵照中央集權領導的指示行事。他們生活簡樸，紀律嚴明。因此，我有一陣子對他們的活動產生了興趣，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也就是我們抵達蘇聯之後幾個星期，我加入了所謂共產主義青年團。⁷³

回憶之時，蔣經國沒有美化中共的必要，應該真實反映了他 16 歲時的觀感。由此可見，任卓宣領導下旅莫支部的措施雖然嚴厲，但較之國民黨人的放任自流，確實有效整肅了黨員的作風紀律，因此至少能感召一些追求崇高理想的純真青年。那麼，究竟要如何理解旅莫支部的爭議？鄭超麟對東大時期訓練場面的回憶，很有參考價值：

每次開會常常兩個，三個，四個鐘頭，緊張，興奮，熱烈。有什麼工作做呢？沒有工作做。有什麼學問研究呢？沒有研究什麼理論問題。開會時間大多數消磨在「個人批評」上面，所批評的並非具體的事實，而是些抽象的心理形態，例如：你個性強，你驕傲，你有小資產階級習氣，你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等等。被批

⁷³ 蔣經國，〈我在蘇聯的日子〉，收入《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第1冊附錄，頁68。根據余敏玲的分析，〈我在蘇聯的日子〉原先應該與〈我在蘇聯的生活〉一樣，出自蔣經國在1937年回國後於家鄉撰寫的俄文回憶錄底稿，內容比較平實，後來才拆分翻譯，改寫為兩份不同名稱的文本，為不同政治目的服務。余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9（臺北，1998），頁128。以上引文雖來自冷戰時期出版的〈我在蘇聯的日子〉，但這一段落對中共旅莫支部評價仍很正面，可能仍保留了回憶錄底稿的內容。

評者也想出類似的批評以批評批評者。結果大家面紅耳赤，心裡種下仇恨種子。總之，大家學會了孔夫子寫《春秋》的筆法：誅心；又學會了宋儒的正心手段，不過不是用來責己，而是用來責人。⁷⁴

很難想像若無與會者的全身心投入，小組與批評會竟可以在「緊張，興奮，熱烈」的氣氛中持續數小時。這種以「抽象的心理型態」批評他人的風氣，有其客觀原因。中國學生在莫斯科處於語言不通、人地生疏的狀態，除了內部紀律的加強，本來談不上什麼具體政治工作與理論研究。在世界青年政治的脈絡中，中國學生對抽象論理與心理狀態的關注，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任卓宣後來雖然明白宣稱自己「志不在讀書，是要早點回國工作」，⁷⁵但由於已能用法文閱讀理論書籍，任卓宣的理論素養，比起初來孫大，語文與理論俱無根柢的大多數中國學生，確實居於領導地位，這也是他自認可以對其它中共學生頤指氣使的重要原因。據說他上任支部書記後，即嚴格貫徹 1923 年 5 月由羅亦農主持通過的〈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訓練工作具體方針〉。⁷⁶以下是其中一些條文：

甲、思想和研究方面的系統化——反對浪漫的彩色。……

五、打破感情的結合。感情的結合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結合——我們的感情是建築在黨的利益上的。

六、團體內沒有等級和工人學生之分——這種心理完全是離開了階級和黨的意識。團體有這種現象即團體一致的精神破裂。

⁷⁴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頁 192-193。

⁷⁵ 任卓宣，〈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頁 75。

⁷⁶ 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頁 122。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的幹部訓練(1921-1926)〉，頁 110。

- 九、研究主義首先要確定階級的觀點。從初步根本的認識入手。不要好高騖遠，終無一成。
- 十、要按照團體所規定的研究計畫和方法去努力。
- 十一、力免學院派式的研究——學院派式的研究即否認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出來的。
- 十二、須隨時準備回國參加實際革命的工作——不要自己以為研究不夠，不願回國服務。
- 十三、除努力研究外，還應注意俄文——絕對不要存先學俄文後研主義的錯誤觀點。⁷⁷

以上是無產階級唯物主義人生觀的典型表達，偏向理論教條，為訓練起到思想指導的作用。按照條文精神，所謂思想和研究方面，側重思維與制度框架的搭建，而不是深微哲學理論的闡述，明顯針對青年喜好抽象思辨的習慣。其反對先學俄文的態度，旨在防止學生一頭鑽入學院派的語詞辨析中。

乙、行動方面的紀律化——絕對反對無政府的傾向，反對鐵的紀律即是消極的幫助有產階級來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

- 十四、要養成政治煽動家和群眾的組織者——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必備的才能。
- 十六、力除知識階級——大學生及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惡習，如果保存這些惡習，即不是真正的投降無產階級，澈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 十七、須隨時隨地互相糾正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錯誤。

⁷⁷ 〈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訓練工作具體方針〉，收入京師警察廳編譯會，《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第3冊，頁801-802。

十八、有意見應發表——隱藏意見不發表即是站在團體以外反革命的動機。

二十、每次寫信不要忘了宣傳——宣傳是每個共產黨人最小限度的義務。

二十二、每個同志至少須與兩個同志以上發生密切關係(除本組同志外)以期達到同志的團結。⁷⁸

這裡談到的行動，主要還是政治煽動家的鼓動宣傳，具體執行組織紀律的部分則很空泛，反映早期留蘇青年學生在缺乏政治實務與組織觀念的情形下，將政治的主要內容理解為論述的傳播與說服，也是青年政治重視抽象論理的必然結果。又一次，唯一具體的組織紀律實踐是與至少兩人結為小組，這仍是承襲自羅亦農、趙世炎時代的規定。而為了使小組發揮互相批評的功能，必須禁止隱藏意見的習慣。

丙、個性方面的集體化——反對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的觀念……

二十四、不要自信太過，要有充分相信團體的心理——不信任團體即是反革命的行為。

二十五、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不要處在個人主義和個人意志的地位——在團體生活和意志之下，我們的生活和意志要絕對的團體化、群眾化，絕對無個人生活和個人自由意志之可言。

二十六、要嚴格的批評同志錯誤，要虛心接受同志的批評——怕批評或不接受批評，和不批評同志都非共產黨員態度。一個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要以互相監督的關係(共產黨

⁷⁸ 〈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訓練工作具體方針〉，收入《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3冊，頁802-803。

員互相的關係即互相監督)批評同志，監督同志——批評是達到培養我們成為鐵一般似的共產黨黨員的手段。

二十七、無產階級的革命者絕無對同志表示藐視、卑鄙、欺騙和其他不合同志態度的行為——他對待同志永久比自己親兄弟還親近些。

二十八、痛改狡猾和一切虛偽的毛病。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團體和同志沒有不赤裸裸的。

二十九、絕對虛心的去改驕傲喜出風頭和一切不落實際的毛病。

三十、我們的性情如果失之於太溫和即表現懦弱，不能做事，但如果失之於暴躁將引衝突和誤會——總之我們要有常態和鎮靜，要用冷靜的頭腦去觀察事實，要有堅決而且積極的精神和靈敏的手段去做事。⁷⁹

這部分是呼籲成員改造個性中的個人主義自我，闡述較為詳細，是整個方針的重點。留蘇青年中，如抱朴、蔣光赤這樣信仰個人主義、堅持個人自由意志、捍衛個人生活的人不在少數，他們對自我的信任，即自信，遠遠大於對組織的信服，使得任何侵犯自我的行為，如同志對己的批評，往往引起激烈反應，使整個批評會陷入圍繞個人、情緒化又無關緊要的爭辯。此所以方針要申述個人自由意志等自我觀念的虛妄，同時闡釋互相批評的必要。倘若青年不能放下自我，小組與批評監督皆不易落實。但一味強調鐵面無情的批評，會傷及青年自尊而失之操切，因此要提倡同志間存在親逾手足的情誼，要求青年放下虛偽油滑、傲慢算計等心思習氣，以「赤裸裸」的坦白面對團體。這樣違反常情的要求很難不引起衝突與誤會，於是又必須要求成員克服懦

79 〈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關於訓練工作具體方針〉，收入《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3冊，頁804-805。

弱與暴躁的性格，心態要堅定沈著，個性穩定，頭腦冷靜，以靈活手段掩護堅決意志，最終才能突破別人的心防，實現真正的組織紀律。24 到 30 條所以反來覆去，即在於要青年改造個人主義的自我，原是一段宛如與虎謀皮的艱難過程，單方面的教條灌輸效果很小。但在當時，任卓宣所能掌握的辦法與資源其實相當有限，只能訴諸長時間的說教。

綜合以上，這份「訓練工作具體方針」旨在加強對成員個人主義，其實也就是青年習氣的規訓力道。基於後見之明，旅莫支部的控制程度，恐怕從未如其條規檔案所示那樣嚴密。與其說這份方針反對理論，不如說是為了打破留蘇學生普遍存在的「大學教授夢」，⁸⁰在實務經驗相對有限的情形下，只能基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極度教條化的理解，試圖使理論上應有的組織紀律成為現實。旅莫支部領導人所以反對理論學習，固然有個人好惡的成分，更主要還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實際組織工作經驗也相當貧乏，無從理解個人自由與組織紀律、理論與實際之間難以截然劃分的微妙關係，也低估了人情常態與傳統認同的韌性。身歷其境的鄭超麟，晚年對此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評價：

這個鬥爭，從整個方面來看，並非全屬私人無聊的鬥爭，也不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鬥爭，而是當時學生中兩種類型的鬥爭。一種類型是敏感的，活潑的，聰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騖遠的，愛自由的，反抗威權的，但不堅定，性格柔軟，傾向於空談。另一種類型則是頑強的，沉著的，果敢的，但遲鈍，狹窄，知識短淺，崇拜威權，容易屈服於威權。⁸¹

⁸⁰ 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的幹部訓練(1921-1926)〉，頁 113。

⁸¹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頁 185。

鄭超麟歸納出來兩種學生類型，認為他們正是因為具有截然不同的天性傾向，導致雙方水火不容。雖然在氣質上，鄭超麟與蔣光赤、抱朴接近，皆是學識相對豐富，對外語與理論知識充滿興趣的書生。但他並未將自己歸入真正的反對派，而是承認自己與大多數人一般，旅莫期間始終服從支部的權威。⁸²這就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在鄭超麟的分類中，像他這類具有鮮明「敏感的，活潑的，聰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騖遠的，愛自由的，反抗威權的」性格的學生，為什麼又會同「頑強的，沉著的，果敢的，但遲鈍，狹窄，知識短淺，崇拜威權」的學生一道支持旅莫支部？從引文看來，一個直接的答案是，兩類學生有的本來就崇拜權威，有的「不堅定，性格柔軟，傾向於空談」，所以面對權威時堅持不下去，終究不免屈服。若是如此，又引發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否能說「敏感的，活潑的，聰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騖遠的，愛自由的，反抗威權的」這些特徵，並不真正構成對威權的拒斥？也就是說，這些特徵本來就與「不堅定，性格柔軟，傾向於空談」互為表裡。這類學生的聰明、多元、理想主義使他們不堅持己見，願意承認別人看法也有其道理，因此容易妥協。若再加拷問，是否這樣的說法，有可能淪為個人自由主義的自我解嘲與自我辯護？何況，如夏濟安(1916-1965)這樣反共立場鮮明的自由主義者，就在蔣光赤的生平與作品中看到，「他只是借追求自由與幸福之名，行自私與冷酷之實。這絕對不是絕無僅有的事例。」⁸³終極的提問是：鄭超麟所謂兩類的學生氣質，是否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是否可能他們的愛好自由、聰明、活潑、多元，與「頑強的，沉著的，……知識短淺，崇拜威權」其實是一體之兩面？本文一再強調羅亦農、任卓宣等人在語文

82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上卷，頁193。

83 夏濟安著，萬芷均等合譯，《黑暗的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79-80。

與理論學習上高人一等，亦在指出：學習抽象知識時的聰明靈活，並不同政治器識的恢弘卓絕。抽象思辨不太依賴對現實具體生活的認識，所以反而容易上手，卻也易於使人錯將有限的論理邏輯或文法規則等同全部真實，以致認知狹隘、知識短淺、卻自以為是，進而能頑強、沉著、果敢地推行無可質疑的「真理」，這也是青年政治邏輯的必然結果。⁸⁴

鄭超麟在文革後回憶往昔，雖歷經磨難，依然堅持某種人道的社會主義理想，所以他固然不遺餘力批評史達林主義的冷酷專斷，卻沒有如八、九十年代許多文革倖存者那樣，簡單倒向當時盛極一時的西方自由主義。⁸⁵或許也因如此，鄭超麟對上述兩類青年跨越意識形態界線的內在同質性，是有所體悟的。所以他說「整個方面來看，並非全屬私人無聊的鬥爭，也不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鬥爭」。他將圍繞旅莫支部訓練對抗的主軸放在學生群體內部。做為學生的青年，也就不只是被動受黨幹部威權壓迫的受害者，而是按照宏觀青年政治的規律，強力推動適應青年政治的新型態實踐。這也意味中國學生雖然在莫斯科接受蘇共的訓練與津貼，且不說所謂聰明多元的學生，思想行為上常常逾越列寧主義組織原則，就是知識短淺崇拜威權的一派，也未必就只是蘇聯共產黨的代理人。

⁸⁴ 義大利共產黨與青年運動領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對此有精彩論述。有趣的是，葛蘭西記取革命失敗的教訓，雖對青年受抽象思辨教育而失去政治能力有深刻反省，對道爾頓制多言少行的問題不可能一無所知，但從自主自由學習的角度，對該制持肯定態度。Qui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it and translate,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2), 122, 174, 179–183.

⁸⁵ 靳樹鵬，〈百歲老人評說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52(香港，1999)，頁 72–74。

四、裡應外合

鄭超麟所觀察到的青年類型，其存在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以下進一步說明。鄭超麟是在 1923 年被選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1922 年，他參與成立了少年共產黨，而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的傳記資料也在同年出版。普列漢諾夫被稱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對 1914 年前列寧先鋒隊理論有重大影響，也是 1920 年代以後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重要思想導師，任卓宣、鄭超麟皆曾翻譯過他的著作，可見他在共產主義革命思潮中的地位。傳記資料的作者列夫·格里戈里耶維奇·捷依奇(Lev Grigorievich Deutsch, 1855–1941)是普列漢諾夫的同志，他的回憶保存了青年普列漢諾夫與同時代革命者的一些重要訊息。例如，青年普列漢諾夫雖然在理念上認同巴枯寧(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的民粹派或暴動派，但在個性與思維習慣上，卻更接近知識分子式的改良社會主義派。他的圈子中的俄國青年似乎也是如此，他們的作風往往是：

當時構成多數的巴枯寧派出於各種各樣的考慮，對書面表述自己的信仰甚至採取極端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這不僅是多餘的，而且對秘密工作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所有這一切，無論是理論觀點和原理，還是策略手段、計畫和協定，都是通過口頭交換意見，然後通過個別轉授的辦法來制定的。

由於同樣的原因，常常很難確切地說，某個人是否參加了某個小組，是否是它的成員，而這一點也未必使很多人感興趣。在大多數場合下，都是這樣：如果某個熟人被認為是這個圈子裡可靠的人、忠於人民利益和有才幹的人，那麼很自然，大家就跟他接近，大致地把自己的計畫和想法告訴他，委託他做這樣或那樣的事，

等等。⁸⁶

巴枯寧這種帶有反理論文字，重視實踐的秘密小圈子風格，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前文鄭超麟所言，如羅亦農那類青年。而與這類人有密切交往的普列漢諾夫則是：

普列漢諾夫當時……還在學院裡學習，熱心地準備考試，而這一點在當時在我們看來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假如他與別的人一樣，毫無目的地，只是為了打聽點消息和隨便聊聊天而常到公寓裡來，那麼由於在我們這些人當中早就形成一種愛聊天的風氣而常常無休止地談論某人正在做什麼或者打算做什麼，在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等等，普列漢諾夫也可能瞭解到各種各樣的計畫、打算。不過，與大多數的同時代人不同，普列漢諾夫從來不喜歡進行這類談話，也對這類談話不感興趣；加之（這也和別人不一樣），他總是十分珍惜自己的時間，把它用於學習。因此，至少是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從來都不是沒有必要或沒有事情而到公寓裡來的。有時，因事使他留在這裡，而這裡又進行上述談話時。他也從不參與談話，而總是坐在一旁，飛快地翻看著隨手拿來的某一本書。⁸⁷

上述普列漢諾夫的形象，看來亦符合鄭超麟的敘事，是聰明多方面的第一類青年，但他也同鄭超麟一樣，在政治上接近似為自身對立面的群體，甚至可以與聞機密。諸如普列漢諾夫這樣愛自由、「珍惜自己

⁸⁶ 列夫·格里戈里耶維奇·捷依奇(Lev Grigorievich Deutsch)著，宋洪洲譯，〈普列漢諾夫的青年時代〉，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四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270。

⁸⁷ 列夫·格里戈里耶維奇·捷依奇著，宋洪洲譯，〈普列漢諾夫的青年時代〉，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四輯》，頁271。

的時間，把它用來學習」的青年，是否真的只是因為軟弱而趨附權威？如引文所言，小組式的聊天談話顯然已經是青年生活中的必須，也就不能真正保守秘密。這種活動有其俄國文化中的淵源。⁸⁸身在其中，表面上普列漢諾夫與民粹派青年有所不同，後者顯然更像日後東大、孫大的黨務派。而普列漢諾夫則具有抱朴、鄭超麟的書生氣質，更喜歡自己看書。但由於雙方存在某種共通的「小組習氣」，這種按政治理念或個人氣質的分類方式或者流於表面，也很難解釋以下的情形：

普列漢諾夫從青年時代起就在他的每一次談話，每一種見解中表現出他的智力才能。上面我已說過，他不喜歡作內容貧乏的談話。但是在涉及書籍或實際革命事務的多少比較嚴肅的問題上，他都樂意積極熱情地參加。當在這樣一些問題上發生爭論時，大家知道，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總是竭力要成為勝利者的。而無論他的對手是什麼人，他最終都能獲得成功，因為除了理論修養以外，他還具有進行爭辯的驚人的機智和才華。……在我同他多年交往的時期裡，……我記得沒有一次，最終不是普列漢諾夫而是他的對手取得勝利的，沒有一次是普列漢諾夫而不是他的對手遭到迎頭痛擊，蒙受恥辱的。在這種場合下，他的反駁常常是那樣地擊中要害，那樣地機智巧妙和出其不意，以致不僅沒有參與爭論的人，而且爭論對手本人，由於聽到他周圍發出的洪亮笑聲而抑制不住地笑將起來，儘管常常對他懷著一種怨恨和惡意。⁸⁹

⁸⁸ Barbara Walker, "Kruzhok Culture: The Meaning of Patronage in the Early Soviet Literary Worl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1 (February 2002): 111–112.

⁸⁹ 列夫·格里戈里耶維奇·捷依奇著，宋洪洲譯，〈普列漢諾夫的青年時代〉，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

現在號稱不重理論的民粹派青年，事實上依然將書本上得來的理論素養做為論辯的根據，也依然拜服於善用理論者的口才之下。並不參與談話、似在低頭看書的普列漢諾夫恐怕也始終豎著耳朵，尋找插入談話的契機。他的風采，並不來自做為民粹派分子的革命實績與政治能力，而是在民粹派觀眾的捧場下，他有能力以抽象口頭論理語驚四座，讓跟他一般對革命實踐只有理論認識的青年拍案叫絕。這樣逞口舌之快而遭致同志怨恨的作法，就維繫組織而言實在難稱高明，但在青年政治的邏輯中確實有其價值與必要。

普列漢諾夫所代表的青年政治傳統是如此深厚，即使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亦不能免俗，必須與普列漢諾夫在辯論中爭勝，此亦所以普列漢諾夫上述言行在 1922 年仍得到出版與紀念。為求克制小組習氣，列寧在 1902 年的〈怎麼辦？〉中痛斥：

青年學生普遍傾心於馬克思主義。……把它當作對於「怎麼辦？」這一問題的回答，……這個學生小組同運動中的老的活動家們毫無聯繫，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區(或其他學校)的小組也毫無聯繫，絲毫沒有把革命工作的各個部分組織起來，根本沒有一個較為長期而有步驟的活動計畫，就去同工人建立聯繫，著手工作起來。……那些一年或幾個月以前在學生小組中講過話和解決過「往何處去？」的問題的人，那些同工人建立並保持聯繫和印發過傳單的人，現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團體建立聯繫，設法取得書刊，著手出版地方報紙，開始講到舉行遊行示威，……只是按老一套進行的那種小組工作的自發進展；……警察局自然差不多總是知道所有那些領導本地運動的、在學生時代已「初露頭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對它最合適的時機來

圍捕他們，而故意讓小組充分發展和擴大，……⁹⁰

所謂老一套小組的自發進展，就是指普列漢諾夫所代表的小組習氣。如列寧所指出，這些做法與動員工人革命所需的說服與組織能力，並非同一回事，甚至存在衝突，事實上很容易就為沙皇當局監控破壞。在此背景下，列寧提出以職業革命家的組織紀律規訓青年學生業餘的小組習氣，也就是所謂的列寧主義先鋒隊理論。但是到了 1904 年 7 月底的〈告全黨書〉，列寧仍在指責：

過去最有威望的一些小組的某些傑出人物，還不習慣黨的紀律所要求的那種組織上的自我約束，總是習慣於把自己的小組利益同全黨的利益混淆起來(在小組活動時期，小組利益同全黨的利益確實往往是一致的)，許多這樣的人物都成了維護小組習氣、反對黨性的首領……一切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離開了嚴格的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分子都成了他們的同盟者，因為只有小組習氣能夠保持這些分子思想上的個性和威望，而黨性則有把他們融化或使他們失去任何威望的危險……。最後，成為反對派骨幹的都是我們黨的黨員，主要是知識分子黨員。同無產階級比起來，知識分子由於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條件，不能直接廣泛地聯合起來，直接受到有組織的共同勞動的教育，因此總是傾向於個人活動。因此，知識分子就比較難於適應黨內生活的紀律，而他們之中一些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自然就打起反對必要的組織約束的旗幟，把自己的自發的無政府狀態推崇為鬥爭原則，錯誤地把這種無政府狀態說成是渴望「自治」，要求「寬容」，等等。⁹¹

90 列寧(Vladimir Lenin)，〈怎麼辦〉，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94-97。

91 列寧，〈告全黨書〉，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

在二十世紀初，列寧即已經被迫處理小組自由研究習氣的問題，也就是說，即使道爾頓制的名稱尚未出現，催生道爾頓制論述的歷史脈絡與條件早已存在。列寧承認小組活動在黨的建設中，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卻也有淪為少數人政治資本的傾向，更不利於組織安全。列寧還清楚看到，小組習氣的精神實質，並不是小組中高談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孕育諸如「自治」、「寬容」等話語的自由主義，其源頭則來自西歐：

在國外的黨組織中，小組存在的時間比較長，有各派的理論家，知識分子占絕大多數，這一部分黨組織必然最傾向於「少數派」的觀點。因此，少數派在那裡很快也就成了真正的多數派。俄國的情況則相反，在那裡，有組織的無產者的聲音比較響亮，黨內知識分子與無產者的聯繫比較經常、比較密切，因而他們就能更多地受到無產階級思想的教育，直接鬥爭的重壓使人們更強烈地感到必須有組織地統一行動，在俄國，正在堅決反對小組習氣，反對瓦解組織的無政府傾向。⁹²

小組習氣顯然是歐洲文化氣候下的普遍產物，只有俄國的土壤還能多少遏制其自然生長。列寧由此提出以支部統制小組的新組織架構，正是為了驅散久久瀰漫於列寧主義黨內青年的小組習氣。然而究其原理，仍在倚賴領導幹部所在的核心小組，來統合管理支部下其他小組，從而既改造小組，也繼承了小組。⁹³列寧以職業革命家與嚴密的黨組織克服青年的小組習氣，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可看出，小組

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頁11。

92 列寧，〈告全黨書〉，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9卷，頁12。

93 列寧，〈論黨的改組〉，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頁77-87。

習氣根深蒂固，不會隨列寧提出支部組織原則而自動銷聲匿跡。列寧主義亦不得不長期容忍小組習氣，並在此現實基礎上謀求改善。前述道爾頓制迅速為蘇聯採用，不過表明自由研討的小組習氣不僅不能簡單視為列寧主義的對立面，反而是後者與生俱來的一部分。

普列漢諾夫的案例鮮活展示：中共旅莫支部的紛爭，看似是實踐與理論一時的分歧，威權與自由難以調和而相互對抗的現象，其實並未呈現出真正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矛盾，本質上很可能是青年政治傳統中列寧主義內部的和而不同。就如我們很難說普列漢諾夫與其同志誰是真正不重理論的民粹派，由於他們物以類聚，難以一刀切分。同樣的，若一定要將羅亦農、彭述之、趙世炎、任卓宣歸入反理論、甚至反革命理想的陰暗政客之列，而將抱朴、鄭超麟視為心地光明的革命理想主義者或正宗理論家，亦是對兩派人共同性格與共存歷史結構的嚴重輕忽。

普列漢諾夫傳記資料的出版說明，在蘇聯當時的政治氛圍中，普列漢諾夫，連同他那個時代青年政治的習氣，依然被視為值得紀念、弘揚的革命遺產。雖然在大批不滿旅莫支部中國學生的支持下，蘇聯方面於 1926 年 6 月取消中共旅莫支部，收回教育訓練權，終結了黨務派長期以來的統治，但這並不意味青年內部所謂聰明多元派與狹窄權威派的紛爭，已在絕對正確蘇聯經驗的仲裁下一槌定音。再考慮俄國深厚的青年政治文化傳統，將蘇聯視為鎮壓青年的外部勢力，也是過於單純的看法。

蘇聯取消旅莫支部，更為直接、全面地介入中國學生的訓練管理，反而使原來的紛爭得到新的動能，以換湯不換藥的新形式繼續下去。很快的，中國學生再次反抗剛剛推翻舊權威的新權威。1927 年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會上，有中國學生在紅場遊行時，竟突然從懷中拉出「托洛斯基萬歲，打倒斯大林」的標語。1928 年 1 月，東方

大學軍事班中國學生又因為不滿校方的黨務與教務工作，集體向共產國際請願，要求提升軍事與理論學習質量。⁹⁴有鑑於當時大多數中國學生對蘇聯政局一知半解，這些行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Trotsky, 1879–1940)的忠誠，不如說是對蘇聯校方不滿的宣洩。⁹⁵當然，中國學生的抗議還是馬上引起了蘇聯當局的警覺，大大強化了整肅、管制中國學生的力度，引發了此後諸如「江浙同鄉會事件」、十天大會等風波。⁹⁶

楊尚昆(1907–1998)於1927年初進入孫大，可謂躬逢其時。他指出：旅莫支部被撤銷後，孫大蘇聯校方中主管教務與黨務者，又分別拉攏俄文與理論程度好的中國留學生，其中俞秀松成為教務派，張聞天(洛甫，1900–1976)則為支部局派，也就是蘇聯主持的黨務派，有中國學生稱之為「旅莫支部殘餘」。⁹⁷有俄文天分的孫大學生王明是支部局派的後起之秀，卻為教務派所瞧不起，認為他沒有工作經驗。實際上，兩派成員的政治閱歷皆很單薄，他們受俄方重視的政治資本皆是透過俄文所呈現的理論表述與溝通能力。這兩派成員只占中國學生的少數，大多數中國學生屬於第三勢力，他們並不清楚兩派的鬥爭，而專注於個人對理論的學習。孫大副校長米夫(Pavel Mif, 1901–1938)聯合支部局派與第三勢力，擊敗了教務派，於1927年9月出任孫大校長後，支部局派成員逐漸因為擔任重要的教學翻譯工作，而成為翻譯派。楊尚昆雖自稱屬於不參加鬥爭的第三勢力，但身為翻譯的他，與翻譯派過從甚密，據他回憶：

94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240。

95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52–54。

96 楊奎松，〈「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頁193–219。

97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63。王凡西事實上將旅莫支部派與支部局派混為一談，從這兩群人的政治本質來看，這種混淆並不算錯。

「翻譯派」自稱「新知識分子」，許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國內的領導人，認為他們不懂理論，認為「實際派」沒有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把中國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來的領導人，譏諷他們不知道怎麼革命，甚至罵他們是「罪人」。參加六大的翻譯工作後，他到處散佈說：史達林講革命形勢的高潮和低潮問題，中國黨的領導人都聽不懂，史達林只好在紙上畫。他就吹這些牛，好像只有他懂，中國革命要靠他這樣的知識分子。⁹⁸

此處「實際派」是指那些在革命中有實際工作經驗，國共決裂後才來孫大學習的中共幹部。這些人的革命經驗，在自命通曉理論的「新知識分子」眼中不值一提。如果有不參加鬥爭的第三勢力，從他們的出身來看，同樣以知識分子為主，其與翻譯派的區別，在俄語能力，而不是意識形態。

東大黨委在學生請願後，即對黨務與教務陸續做出相應的調整，主要精神就是強化蘇聯指導員對中國學生各小組的直接控制，同時使小組發揮更多規訓引導學生的功能。如 1928 年底的會議上，即提出以下辦法(摘錄)：

1. 黨的每個小組，應減少組員的數目，自然在另一方面，就要增加黨組數目(以前每組有四十人左右，同志意見不能充分發表，以後每組應減至廿五人，或至多卅人)。
2. 黨組組員之分配，不應像從前一樣，按教務班來分組；而是要按照組員的成分來分組(如黨員和團員，工人和學生，黨齡長和黨齡短的，應平均分配在多組)。
4. 組會上應注意組員的所最感切身的問題(如中國問題、軍事問題、本

⁹⁸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 33。

組日常問題等)。

5. 注重培養本組的工作人，增加各同志對一切工作的積極。
6. 盡可能的平均分配工作。
7. 在每月終結時，三人團應向本組做工作的報告。
8. 組織員及三人團應隨時指定本組參加實際工作的同志向三人團或組會上做他自己的工作報告。
9. 組織員及指導員每月應向黨委做報告。
11. 每週在黨組織會議前，應先開三人團會議，討論組會事項及本組其他事項(三人團會議，必須指導員參加)。⁹⁹

此處三人團是指由黨組組長、班長、指導員組成的領導核心。其中組長與班長是中國學生，指導員則是校方指派的俄國人，一般是教職員。¹⁰⁰三人團的作用顯然是在中國小組內部打入校方的監督。第1、2、4、5、6條應該是回應中國學生要求，藉由減少組員數量，討論切身問題，平均分配工作等手段，增加小組成員的參與感，相應的，對各小組的控制也趨於嚴格，例如11條要求三人團會議必須有俄國指導員出席才能召開，而俄國指導員其實並不是小組成員。又比如第2條將中國學生按政治成分平均分配，一方面避免有的小組全是政治文化水平低下的工人學員，根本沒有開展小組活動的能力。但另一方面，這種平均分配，使聰明而追求自由者與狹窄而服從權威者混合在一起，為領導操作分而治之留下了空間，此種設計已見諸旅莫支部的小組。

想要實現對小組的有效管控，三人團成員就必須具備較高的政治領導能力，不僅是分配工作與批准活動，還要能處理成員的日常與公共事務，更重要的是在小組討論中發揮引領作用，統一成員的思想。

⁹⁹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104–105。

¹⁰⁰ 在孫大，往往因人才不足由校外聘請資質不佳的指導員，這種情形應該也存在於東大。孫會修，〈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小組指導員問題研究〉，頁117。

所以校方同時也要求三人團在小組討論前要有充分準備。¹⁰¹不過這樣的要求往往難以實現。具有優異政治領導能力與理論素養的人才本就難得，何況優秀人才往往能者多勞，分身乏術。理想的俄國指導員尤其不敷所需，校方只能從校外尋覓，對其政治素質的要求也不得不大為降低。於是俄國指導員經常給中國學生一種傲慢敷衍的感覺。王凡西(1907-2002)回憶 1927 年底進入東大後某次小組會的情景：

有時，我們企圖將自己的經歷作一番推廣，將它一般化一下，想以此印證或批評文件中某一個見解，但發現列席的領導者帶著優越的微笑，輕輕兒的向你指出：「同志，你這個意見恰好就是托洛次基(或拉狄克)所歡喜的。」發言人便立即覺得狼狽萬分，惶恐地將意見撤回了。¹⁰²

王凡西嘗試將自己經驗「一般化一下」，應該是以抽象普遍話語與論理技術，使個人有限的閱歷更具代表性與正當性。蘇聯指導員或許深諳此道，也或許根本不耐煩與王凡西等人糾纏，直接挑明論者言論有托派傾向。這樣不由分說的政治教育，在王凡西回憶中，成了斯大林主義蠻橫壓制學生自由思想的證據。當然，王凡西所見，未必代表所有小組與俄國指導員的情形，但蘇聯校方的政治教育實踐，肯定不能使所有東方大學軍政班的學生心悅誠服。1928 年 3 月 5 日，一名學生在寫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信中，毫不掩飾地抱怨：

小組會的三人團雖已改選，但是小組會依然時常停止。一個月一次的大會更不用說了。問以理由，則非推之於沒有指導員，便藉口於討論的材料缺乏。若是推之於指導員，則小組會者，指導員之小組會也，非黨內群眾之集體，亦無須有小組書記之必要了；如推之於材料缺乏，則姑妄無論我們所未討論的尚有許多，就是

101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 105。

102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 58。

沒有材料吧！同志間的批評以及黨內生活的討論等工作，都是很重要的，而上級負責者竟視為無關重要，此可知東大外國班黨委會的組織形式，是宗法式的制度，黨內的工作，純是具文而已，實實在在的說，又有什麼黨的生活呵！¹⁰³

中國五四以來反傳統話語中的宗法大帽子，如今竟被一個來蘇聯留學的中國學生，義憤填膺地戴在革命先進國家校方的頭上，說明中國學生在對蘇聯的信仰之上，還存在對更高理念的堅持。對小組實況的嚴厲批評，適足以反映他對小組的期望之深。其中就包含對理論材料，對自由討論，以及「同志間的批評」的深切渴求。同樣的活動訴求，其實也在抱怨旅莫支部的言行中顯露。只不過先前中國學生視蘇聯校方為同情、理解他們理想的救世主，如今救世主真正接管小組，他們又埋怨校方是封建宗法的家父長，回頭向中共求助。這位學生接著指責：

黨務一方面，純是幾個上層分子，任意操縱，混亂組織，既不早速的果決的執行上級機關的命令，又不肯接受黨內群眾的督促和批評，強非為是，武斷獨裁，近且呈笑罵任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的醜態，——教務負責者亦然。這樣的危險，是如何的大呵！不唯培養了許多拍馬者，形成了許多（對於學員）消極者，而且將許多的忠實同志，驅投迷途，莫知所是。¹⁰⁴

該生批評時似乎從未想到，蘇聯校方的改革方向，本來就是為了加強控制。如「好官我自為之」這類帶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色彩的意象，如今生搬硬套為激進民主話語的素材，將蘇共的組織原則批評得一無是處，幾乎完全模糊了外來啟蒙者與中國被啟蒙者之間的分際。先進的蘇共幹部，本應是顛覆現狀的能手，轉眼之間被中國青年描繪成顛

¹⁰³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124。

¹⁰⁴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124。

預的守舊派。更有甚者，在政治閱歷並不豐富的中國青年眼中，革命國家指導員的見解經常也是不切實際的泛論，例如隨意點評中國革命的性質，甚至「以為暴動時，只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向該地稍有黨的影響的軍隊開會演講，使其投降，則暴動就可勝利了。」¹⁰⁵親聞中國革命的青年，即使再缺乏經驗，也很難不為這樣幼稚的政治見解所震驚。問題在於，高明的政治家本是極為稀缺的人才，即使有政治天分，對中國實情甚為隔膜的蘇聯指導員也只能發表原則性意見，何況蘇聯指導員多半只是政權機器中的一枚螺絲釘，與他們指導的中國小組成員，在政治見識上半斤八兩。在此情形下，寄望以先進理論與談話技巧的傳授，大幅增進政治能力的教育設計，本身就是鏡花水月。¹⁰⁶

除了輕視指導員的水平，該軍政班學生還埋怨學習「形同兒戲」，也就是無論理論與實務皆非常貧乏，重要課程如馬列主義與射擊學，教職員經常敷衍了事，不是缺課，就是以演講匆匆帶過，書籍資源也非常缺乏，以致中國學生在請願後兩個月幾乎無所事事。¹⁰⁷這中間自然有蘇聯校方的算計與自以為是的傲慢，¹⁰⁸然而從 1928 年底蘇聯校方的改革提案來看，也不是純然壓制中國學生，亦有響應青年訴求的舉措。例如豐富了俱樂部的各類活動，補貼學生的文娛費用等，¹⁰⁹但

¹⁰⁵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 125。

¹⁰⁶ 在孫大指導員的案例中，中國學生對蘇聯指導員的政治水平，也有類似的抱怨。但如孫會修指出，蘇聯方面有許多客觀困難難以克服，例如小組會常開至深夜，蘇聯指導員便無法搭乘公共運輸回家。又比如在合格指導員非常稀缺的情形下，優秀指導員即使能者多勞，也無力為每個小組盡心盡力。孫會修，〈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小組指導員問題研究〉，頁 117-119。

¹⁰⁷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 125。

¹⁰⁸ 余敏玲，〈國際主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頁 254。

¹⁰⁹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 105-106。

最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對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也做出改進，如以下幾條：

3. 為隨時改善教授問題，應在相當期間召集教員和班長的會議。

4. 教員應注意：

(1)按各班程度的高低，對各種教材施以相當深淺的解釋；

(2)不缺課。

(3)所任課程相同的教員，應常開會討論教授方法。

二、書籍與圖表

1. 請專人負責管理布爾什維克各種書籍圖表以及一切參考的材料；

2. 利用他校(如孫大)出版物；

3. 按教課上臨時的需要，在各教室裡陳設適應的圖表，並須加中文解釋。¹¹⁰

這些條目可說皆是針對前述軍政班學生不滿的回應。不論最後落實了多少，蘇聯校方配合中國學生需求的態度還是相當明確。有趣的是，這些訴求與調整，與道爾頓制的實驗室或作業室辦法有諸多類似之處。例如強調師生的合作、參考書籍的充實、圖表的應用、學習與教學計畫的制訂、各教師教學方法的協調。這些舉措當然有提升政治訓練成效的考量，但最明顯、直接的效果，似乎是迎合中國學生，或許也包括蘇聯自己，在道爾頓制這類號稱自由研究教學法上投射的政治想像。可以說，上述中國學生對蘇聯指導員的批評與抱怨，成為蘇共改進自身政治教育實踐的壓力，並嘗試維持、乃至提升實際上難以為繼的高水平小組會。

¹¹⁰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頁103。

需要指出，本文無意宣稱 1920 年始出現的道爾頓制是中蘇共產黨小組活動的唯一基礎或源頭，也無意否定意識形態對革命的引領作用。只是想要強調道爾頓制與小組兩者，皆發軔於西方青年政治文化的脈絡。換言之，道爾頓制只不過是諸多反映西方青年政治文化的類似實踐之一，不是列寧主義政黨所獨有。唯其如此，兩者分享著共同的自由研究理念與做法。對中外青年而言，但凡能在其中發現自由研究的元素，乃至影子，則無論名目是小組、道爾頓制，還是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皆可以成為值得嚮往的對象。下一節將要顯示，當青年開始對意識形態與組織需求有更確切認識，道爾頓式小組的吸引力反而大不如前。

五、上海大學的小組

蘇聯成立後，最迫切的問題是擊退資本主義列強的軍事入侵，並從根本上打破英日為首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政權的戰略圍攻。在全世界推動無產階級革命，其實更多是打破封鎖的政治修辭。到了 1920 年代初，蘇聯開始意識到，積弱的中國可能正是帝國主義封鎖最薄弱的環節。當時門戶開放政策依然是列強處置中國的基本方針，其實質意義就是以最小成本，扶植中國代理人以維護各國勢力範圍的大致穩定。在此格局下，中國的北京政府與各系軍事集團，受不同帝國主義勢力挾制，只能依靠外國給予的微薄借款，維持不對列強利益形成威脅的鬆散統治，卻也因此在各方勢力內外留下大量權力縫隙，成為蘇聯扶植自身代理人的戰略空間。新生的蘇聯很快繼承沙俄與西方同行的帝國主義標準操作程序，一方面與北京政府直接談判，同時連絡不受北京政府控制的吳佩孚(1874-1939)、廣東的陳炯明(1878-1933)等地方實力派，尋求改善關係與共同對抗其他帝國主義的機會。孫中山的國民

黨只是蘇聯接洽的眾多地方勢力之一。石川禎浩的研究證明，蘇聯在一手創建上海的中國共產黨之際，依然同時資助中國內外其他可能成為正統「中共」的小團體。¹¹¹簡言之，蘇聯深知在地緣政治的遊戲規則中，意識形態或所謂價值觀，只是決定敵友的眾多因素之一，國家利益才是決策的真正關鍵。

在此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蘇聯當局基於歐洲青年政治傳統，對於中國青年的戰略價值，有其源於西方歷史經驗的充分認識。以列寧為代表的蘇共領導層不僅深諳其對手羈縻青年的手法，還掌握了破解之道，很早就將目光投向西方控制下的青年教育領域。青年共產國際(或稱少共國際)在1919年底成立後，很快就發出指示：

西歐的組織應當設法在殖民地青年當中培訓共產主義分子並使他們革命化，要把青年按地區組織起來。這些青年的一部分在美國、歐洲、日本、俄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學習，一部分在中國和印度的英國學校學習，大部分青年處於基督教青年會及各種美國民主組織等的影響之下，而在俄國學習的殖民地青年又常常受到僑民的民族主義的禁錮。必須使這些青年與地方的青年團組織密切聯繫，以便使他們瞭解文明社會，學會認識文明社會的階級本質。¹¹²

蘇聯最初尋覓的青年合作者，不是尚未受殖民教育影響的本土菁英，而是在西方教會學校中學習的新青年，這種策略看似反直覺，其實是蘇聯對西方以及自身帝國主義心法的深切體會，同時符合馬克思主義

¹¹¹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第2章第3節，頁116-142。

¹¹² 〈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綱(節錄)〉，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207-208。

理論與蘇聯的地緣政治利益。首先，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傳統，它的革命是迎向未來，而不是保存在其理論中，比殖民主義更落後的民族文化。就便於控制而言，蘇聯同西方、日本一樣，皆不希望殖民地出現強大的民族主義政權。也因此，受殖民地基督教教育的西化青年菁英，就成為最理想的革命代理人。他們已受「進步」文明影響，再接受西方文明自身發展中更進步的成分，也就是共產主義，要比傳統主義或民族主義者要容易許多。更重要的是，蘇聯人很清楚，青年原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所以中國雖然只有一部分青年在英國學校學習，卻有「大部分青年處於基督教青年會及各種美國民主組織等的影響之下」，這既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為培養代理人而銳意經營，卻也是現代性透過教會學校以外一般新式教育大範圍傳播的結果。換言之，青年的出現是歷史的必然，對於共產革命運動而言，自然要加速必然性的實現。所以青年共產國際還指示：

在教育方面，青年組織應當為免費普及對勞動青年的教育和保障廣大青年群眾受到用現代教學方法進行的歐式教育而鬥爭。

另一方面，應當與征服者在殖民地人民中搞的宗教經院式的學校教育進行鬥爭。¹¹³

蘇聯刻意將現代歐式教育與「宗教經院式的學校教育」區別開來，當是出於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鬥爭的緣故，無神論的唯物主義不承認宗教，教會學校培養親西方菁英也對蘇聯不利。考慮到這樣的區分在實際發展青年時存在困難，蘇聯的真正假設是：廣義的現代歐式教育仍有助青年的養成，而一旦成為青年，即令初始受了基督教與美國民主組織的影響，蘇聯人就有信心使他們進化為共產主義反帝運動的先鋒。基於以上戰略思考，蘇聯策動中國革命的最初幾步，除了上述在

¹¹³ 〈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綱(節錄)〉，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1917-1925》，頁 207。

教會學校吸收青年幹部外，甚至還入室操戈。在一份完成於 1922 年 5 月，也就是五卅運動三年前的報告中，蘇共在華官員就「通過派我們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分參加會議來從內部破壞基督教代表大會」、「通過派我們的同志參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組織來瓦解基督教同盟」。¹¹⁴在展示其在非基督教運動中的成績時，該名官員得意地提及：

英國人的報紙，一開始想對這場運動保持沉默，而當運動規模之大已使它們不能保持沉默時，便對運動進行了特別惡毒的攻擊。它們斷定，整個非基督教運動只不過是一個隱蔽布爾什維克的屏幕，它們的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非基督教同盟只不過是一個合法的擋箭牌，使我們能夠公開地和廣泛地進行宣傳活動。……¹¹⁵

學者指出，在五四以前，基督教青年會即是上海地區最有動員能力的組織，其原因即與青年會平日養成的各種活動實踐有關。早期上海各校學生組織大多皆發軔於基督教青年會。¹¹⁶此時中共成立僅僅幾個月，可說還是襁褓中的嬰兒，卻能爆發如此強大的組織能量，蘇聯的指導不可或缺。1922 年 4 月 4 日，蘇聯選中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於北京清華學校召開年會的時機，以滲透青年會為手段，以非基督教運動打開反帝國主義局面，可說是攻敵所必救，是對英國在華戰略與要害部門的精準打擊，表現了帝國主義內行人的洞察。蘇英雙方爭奪中國

¹¹⁴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 年 5 月 20 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 92。

¹¹⁵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 年 5 月 20 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91-92。

¹¹⁶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頁 327-329。

青年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攻防，尤其體現了青年政治在大國戰略中的重要性，看似非政治性的宗教文化交流背後，其實蘊蓄著非常現實的政治動能。但也不應忘記，基督教青年會所以有動員能量，中共所以能迅速利用，正說明中國青年已是一股蓄勢待發的社會力量。許多非基督教運動的健將，如惲代英，與其說是蘇共或中共培養後派進基督教同盟地方組織中的內應，毋寧說本是教會學校與青年會的一分子。蘇聯人的老練，也在於看出這些由新式教育養成的青年是可以爭取的同盟。因此蘇聯官員一方面清晰認識到，此時期社會主義青年團受其小組習氣的局限，政治能力不高：

脫離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從另一方面來說，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也沒有聯繫。這是我們共產主義小組的第二個不幸。這裡又表現了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所特有的小組習氣。它們把自己局限在單獨的獨立小組中，不大能從事實際革命工作，滿足於像在溫室裡那樣栽培共產主義。¹¹⁷

中文「習氣」一詞，不太能表現俄文原文中的強烈負面意涵，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將習氣理解為青年在小組中的一般慣習。¹¹⁸此時無論蘇聯幹部還是留蘇學生的數量皆微乎其微，中國青年的小組習氣未必是共產主義所特有，而更主要是歐式教育青年的普遍表現，這使「上海的群眾大會不帶有示威性質，而好像帶有嚴肅報告的學術性質」，¹¹⁹

117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年5月20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87-88。

118 俄文「習氣」後詞尾表明了此詞帶有相當負面的意義，承余敏玲老師告知筆者，謹此致謝。

119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年5月20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89。

不免使青年與底層工人溝通的能力，有時甚至不如老國民黨人。¹²⁰而另一方面，正因為這種青年小組習氣：「中國共產主義組織依靠社會主義青年團，能夠輕而易舉地在激進的知識分子中間，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開展大規模的運動。」¹²¹這再次說明，即使蘇聯也不諱言，反帝戰略最初僅僅是建立在青年的基礎上，這就使非基督教運動，及其後國民革命運動，帶有青年政治脫離實際、重視論理的鮮明特徵。

蘇聯的國民革命戰略若要得到進一步發展，青年政治固有的特質，顯然只是星星之火，要成燎原之勢，就不能只動員青年，還需要傳授他們有效的理論與技術，以克服脫離群眾與實際的習氣，建立更為廣大的政治社會同盟。一所符合蘇聯戰略，旨在以改進的歐式教育，激發青年與工人現代文明階級意識的學校：上海大學(簡稱上大，1922–1927)，於是應運而生。

上海大學最初由國民黨人于右任(1879–1964)出任校長，但真正負責校務的則是中共黨員鄧中夏(1894–1933)。上海大學成立後，雖然很快成為國共合作的示範據點，也聘請了一些國民黨人講學，如戴季陶(1891–1949)，還有一些黨派色彩不濃的學人兼課，如朱光潛就曾在上大教過抽象思辨所需的邏輯。但校中教師主要還是中共早期最活躍的理論家與宣傳家，地位最高者如擔任社會系主任的瞿秋白。中文系主任是陳望道(1891–1977)，他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另外還有惲代英、蕭楚女(1891–1927)、李漢俊(1892–1927)、施存統(1899–1970)、

120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年5月20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87。

121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摘錄)1922年5月20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87。

沈雁冰(1896-1981)、田漢(1898-1968)、楊賢江(1895-1931)等人，皆是當時文化界的新星。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彭述之、蔣光赤、鄭超麟也曾在校任教。從上大的師資也可看出，中國革命中的馬列主義元素，除了透過蘇聯直接輸入，還包括惲代英一輩從英文、日文管道汲取的部分。考慮到彭述之、蔣光赤等人是 1924 年以後才來到上大，在國內的聲望名氣，遠不如已經在全國性刊物《學生雜誌》上長期撰文的惲代英、楊賢江、蕭楚女等人，馬列主義的傳播，可能不僅是蘇聯陰謀與特殊道路的結果，更可能是一個廣泛的西方現代性現象。

在成名之前，丁玲(蔣冰之，1904-1986)曾在瞿秋白、施存統的介紹下，於 1923 年夏進入上海大學，算是較早期的學生。她的晚年回憶中，對於瞿秋白等教師音容笑貌有細膩而浪漫的描述，可以看出她為瞿秋白的學識與談吐深深吸引。¹²²但她對於上大的教育方式，卻沒有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頗有微詞，如 1956 年的訪談中說：

在上海大學待了些時候，覺得教員時常缺課，學不到什麼東西。

又中途離開上大，到北京，想考北大。又補習了一個時期，但估計考不取，於是就過自由學習生活，有時也去一面做工一面在北大偷聽幾次文學課。¹²³

上大雖具正規大學的形式，本質上仍是一所革命幹部學校，教師由職業革命家兼任，經常缺課本屬情理之中，但對 19 歲的丁玲而言，除了瞿秋白講述的俄國文學世界令她心嚮往之，其餘那些革命理論並不能真正引起精神共鳴。丁玲的例子說明，青年雖然普遍有先覺善鬥傾向，但也不能說所有青年就是天然的共產主義革命者，他們仍會因為

122 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收入張品興編，《中國二十世紀散文精品：丁玲卷》（臺北：太白文藝出版社，2002），頁 204。

123 王來棟採訪、編輯，《中共創始人訪談錄》（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頁 111。離開上大的決定可能也與丁玲、王劍虹與瞿秋白的三角關係有關。

不同個性與追求，而對青年政治及其技術抱持相當不同，甚至衝突的看法。¹²⁴

丁玲雖未提及小組，但可以確定的是，上大成立後，校內即有一個直屬中共中央的教職員小組，成員先後有瞿秋白、施存統、惲代英、蕭楚女、彭述之等。¹²⁵1924年1月的檔案材料中，施存統還提議：「同志在此中應作有系統的活動」，又說「因開會太多，希望減少。希望C. P.同志小組會議只每月開一次」，「舊組長辭職，新組長未派，似乎地方委員有些疏忽。」¹²⁶說明小組在上大不僅存在，而且活動頻繁，但初期形式內容流於散漫，徒增成員負擔，對小組長的指派也不上心，所以施存統希望同志在上大能「有系統的活動」。¹²⁷同樣是1924年1月的一份青年團文件則顯示：上大支部有48人，雖有不按時繳黨費問題，但每兩週開一次會，「尚有精神」，還在校內組織了「社會問題討論會」以利宣傳。¹²⁸到了5月，支部人數增加到77人，分成13小組，活動情形如下：

除受地委命令參與各種活動外，在校內實在很難活動，因為國民黨的關係並歧視的緣故，時有暗潮。校內所設的平民學校及學生

¹²⁴ 李志毓對中共以外，國民革命前後青年內部的多樣性與矛盾有精彩分析，見李志毓，《大浪淘沙：中國革命中的國民黨左派與知識青年(1920-193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5），特別是第6、7章，頁283-384。

¹²⁵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編委會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下卷，頁1025。

¹²⁶ 〈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記錄——改選地委與編組名單(1924年1月13日下午3時)〉，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編委會編，《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492。

¹²⁷ 〈上海地委兼區委會議記錄——改選地委與編組名單(1924年1月13日下午3時)〉，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492。

¹²⁸ 〈團上海地委報告第六號——1923年十一、十二兩個月的活動情況(1924年1月10日)〉，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457。

會都為我們所操縱。我們又發起社會問題研究會，但不甚活動。書報流通處為我們所把持，販賣我們自己的出版物——《中國青年》、《嚮導》、《前鋒》等——及新文化書籍。¹²⁹

4個月內黨員增加了不足30人。每個小組約有5到6人。這一發展速度與規模，與一年後五卅運動革命熱潮中的情形自難相提並論。此時上大校內顯然已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以致國民黨右派與共黨學生互相破壞對方的活動，校內組織與宣傳工作有時難以開展。有則上大學生的回憶頗值一提：

學校所有活動都是以國民黨和學生會組織出面進行，常常見到國民黨區分部和學生會兩張佈告貼在一起。如辦平民夜校是用的國民黨名義，而各種社團活動，支援工人罷工進行募捐，則是由學生會組織。但是，不論是國民黨出面組織還是學生會出面組織，都是由共產黨決定的。當時共產黨沒有公開，國民黨的負責人都是跨黨的共產黨員，學生會負責人更不必說，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¹³⁰

國共合作下，上大教職員如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1900-1933)等，在1924年皆參與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組建與領導工作，擔當起同時壯大「民校」(即中共給國民黨的暗號)與「大學」(中共自己的暗號)的任務。例如，《申報》1925年12月28日刊登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知，即請各省區代表「所有領旅費事請到閘北青雲路上海大學惲代英同志處接洽」。¹³¹根據中共總結1925年3到9月學生工作的報告：

129 〈團上海地委報告第三號——關於五月份代表大會情形(1924年5月24日)〉，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457。

130 〈周文在同志的回憶〉，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142。

131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省區代表公鑒〉，收入《20世紀20

上海大學：此支部現達一百二十人，佔學生全數四分之一。民校有三百人以上，佔學生全數四分之三弱。我們在民校中雖佔八分之三，但我們在中可以操縱，在學生會亦可如是。不過我們為避免包辦及恐分裂起見，對於學生會的職員，各系都分配有人，平時遇有重要事故，開大會解決，我們多可得勝。此外我們活動的團體，尚有社會科學研究會和演說練習會，我們藉此聯絡新的同學，或做公開的宣傳，以找尋我們的對象。¹³²

正式的中共黨員雖只佔全校學生四分之一，但由於大多數國民黨員其實也是中共發展而來，隨時可以轉為社會主義青年團、乃至中共黨員。這些預備成為共產黨的國民黨員也很願意配合中共的政策。憑藉較為有效靈活的手段，中共得以相對少數，控制學生會、書報流通，以及國民黨區黨部等上大關鍵部門，也就掌握了設定議程與引導認知的能力，在上大校內的優勢已經相當明顯。向學校附近社會群眾開放的平民學校，則擴大了知識青年與下層群眾的接觸，為五卅運動奠定了大規模動員基礎，1924年上半入學的張琴秋(1904-1968)是一所平民學校校長，吸收了3、40名工人入黨。據她回憶，她的小組每週皆開會，內容主要是討論宣傳教育工作。¹³³

但資料顯示，在五卅以前，許多上大小組因為成員忙於參與校外的政治工作，其實很少開會，有人甚至入黨後未被編入小組，¹³⁴直到

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379。

132 〈團上海地委學生部工作報告——關於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學生運動情況〉，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459。

133 張琴秋，〈關於上海大學的回憶〉，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024。

134 〈周文在同志的回憶〉，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142。

五卅後才有所改進。¹³⁵很多女生，其實和丁玲類似，只在意自己學習，對政治熱情有限。¹³⁶綜合以上，五卅前上大的小組已經普遍。大體而言，多數學生仍然十分熱愛小組討論。1924年夏天入學的陽翰笙(歐陽本義，1902–1993)回憶：

我們住在時應里的過街樓上，秋白、存統、蔣光慈都常到我們的住處來，他們一來，我們就把他們圍住，提出各種問題，探討問題、熱烈地辯論問題，有時覺得他們的講法不能理解，就跟他們辯論，爭來爭去，氣氛十分熱烈。秋白、光慈喜歡喝點酒，在附近有個小店，賣高粱酒、花生米、豆腐乾、牛肉乾之類，有時他們去買，有時我們去買，一面喝一面談問題。¹³⁷

這種聚會的形式內容，當然不如正式會議條理分明，此所以施存統要呼籲同志少開小組會，做「有系統的活動」。但換一個角度，瞿秋白等人是受過蘇聯專業談話技術的職業革命家，他們可能已掌握對內談話應不拘形式、不露痕跡的道理，不像謝懷丹那樣，將對內談話理解為不苟言笑的正式表態或勸說。丁玲記下了她初見瞿秋白的細膩觀察：「話不多，但很機警，當可以說一兩句俏皮話時，就不動聲色地渲染幾句，惹人高興，用不驚動人的眼光靜靜地飄過來。」¹³⁸寥寥數語，足以窺見瞿秋白在隨興漫談的場合裡冷靜觀察與調動情緒的功力。這是不是能簡單理解為瞿秋白的天賦呢？如同中共另一位早期領

¹³⁵ 黃旭初，〈我在上海大學的一段經歷〉，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021、1024。

¹³⁶ 丁敬先，〈1925年五卅上海大學學生反帝鬥爭回憶〉，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025。

¹³⁷ 陽翰笙，〈回憶上海大學〉，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037。

¹³⁸ 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收入張品興編，《中國二十世紀散文精品：丁玲卷》，頁204。

導人顧順章(本名顧鳳鳴, 1904-1935)曾赴莫斯科學習間諜技術。他能主掌特別行動科, 並非僅僅憑藉著天性機警, 身手過人而已。瞿秋白也是從蘇聯受過對內談話的專業訓練, 丁玲的文字, 很可能無意中捕捉到了當時世界先進政治技術在中國擴散的痕跡。這樣透過師徒口傳心授的散播過程, 不可避免會有失真誤解的地方, 但無論是否以小組會為名, 是否為當事人意識, 又是否真能心領神會, 可以確定小組技術及其習氣, 就在這樣彷彿無所用心卻令人欲罷不能的意氣相投中, 如水之就下, 如霏霏春雨, 浸染了每個青年的心田。與之相應的是, 如陽翰笙所感:

到了「上大」, 覺得一切都非常新鮮, 許多理論和道理是聞所未聞的, 所以就拚命地學習、研究。但當時碰到的幾個方面的問題很惱火, 第一個是瞿秋白講的社會學裡面, 唯物論、唯心論; 唯物史觀、唯心史觀; 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 量變質變、對立統一等等, 搞得一腦袋的名詞, 雖然講解了, 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清楚, 要看很多參考書才能懂得, 要理解這門學問不簡單, 用了許多功, 看了許多書, 才算初步懂了一點。¹³⁹

陽翰笙為何感到惱火? 不妨讀一段瞿秋白在上大的講義《現代社會學》:

「互辯律」——“Dialectique”在希臘古代本是辯論術之統稱。第一人說「甲」, 第二人說「乙」以駁之(即否定「甲」)。最終合「甲」「乙」之長處而得真理「丙」。所謂「真理出於辯論」。思想過程都是如此: 既有「有」的觀念, 便有「無」的觀念, 抽象的「有」

¹³⁹ 陽翰笙, 〈回憶上海大學〉, 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 下卷, 頁1038。

「無」原是相等的；「有」與「無」統一方能合成一「成」的觀念——「無甲便成有乙」。物質世界的一切動象亦是如此。¹⁴⁰此處瞿秋白基本上是將古代辯論術與現代辯證法相聯繫，最後強加此乃物質世界定律的結論，應是根據蘇聯教科書做出的「通俗」解釋，只能說推論相當跳躍。加之通篇新詞生硬晦澀，鑽之彌堅，研之彌昏，無怪乎學生要感到惱火，卻也無礙於青年對抽象思辨的追求。

毫無疑問，共產黨員，或者也包括他們發展的國民黨人，在 1925 年 5 月以前的數年經營中，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普及了大規模反帝、反軍閥運動所需的政治技術。《民國日報》1925 年 5 月 21 日刊登的國民黨區分部消息，實際上幾乎全是上大共產黨人主持各種集會與宣傳講話的動態。¹⁴¹五卅運動前後一連串成功的群眾動員，更使上大對自己的工作成效有了十分樂觀的估計：

年來學生運動，受客觀環境的影響(帝國主義的侵凌及其工具軍閥的壓迫)和我們的宣傳，已漸入於佳境，尤其是在各校學生會和學聯會，佔有相當的勢力，能使我們的計畫多可以實現。這不僅是我們的宣傳工作見效，而且足以推進歷史的前進。五卅運動，實為我們團體半年來加緊訓練同志的收穫。如果此次五卅運動可以比擬蘇俄之二月，那麼我們的十月，當不在遠了。¹⁴²

以上大為指揮中樞，透過遍及各校的支部與小組，中共確實在青年學生中取得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在工人與群眾運動方面也有突破性的

¹⁴⁰ 瞿秋白，《現代社會學》，收入《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 840。

¹⁴¹ 〈國民黨區分部消息〉，收入《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 378-379。

¹⁴² 〈團上海地委學生部工作報告——關於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學生運動情況〉，收入《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 45。

進展，其中留蘇學生如趙世炎等居功厥偉。¹⁴³但若無英日帝國主義者冷血無情地槍殺群眾，引發了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群眾的同仇敵愾，僅憑上大青年師生原有的政治技術儲備，也就是圍繞小組開展的宣傳，恐怕未必能掀起國民革命的滔天巨浪。英國人對其帝國事業宿敵的青年政治策略，自是一目瞭然，對這樣有組織的戰略行動，豈能坐視？更不會為非暴力抗爭的表象所迷惑，而於武力鎮壓群眾有所顧忌。這點也在蘇聯意料之中。蘇聯所以打出反帝國主義的旗號，就是看準「無論何人均不若青年者感受帝國主義壓迫之深切，亦無論何人均不若青年者感受必須與壓迫者戰鬥之劇烈。中國共產黨應該熟慮及此而致力於青年之工作。」¹⁴⁴為了將中國青年發動起來，也為了最大限度將帝國主義國家的軟硬實力消耗在中國，蘇聯甚至指示其駐華官員刺激列強武力鎮壓中國群眾。¹⁴⁵這樣冷酷的訓令雖發布於五卅以後，但蘇聯與英國等帝國主義者圍繞上海的攻防，早已注定了五卅慘案不可避免。

¹⁴³ 相關經典研究見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 4, 69–87. 孫會修的研究指出，直到大革命結束，工人支部基本上仍由青年團主導，黨與團界線模糊，許多支部與小組區別也不明顯，黨的力量有限，工作方法也往往未能適應工人團體的生活型態，工人支部仍以同鄉人際關係維繫，難以進一步擴展。孫會修，〈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區委的城市支部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6：1（北京，2016），頁 51–53、56。也可以看出，在被國共組織起來以前，工人與普通群眾顯然缺乏由其生活內生的政治技術淵源。只有知識青年可由諸如道爾頓制等非政治途徑自主學習政治技術。

¹⁴⁴ 〈第三國際共產黨大會第七次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收入《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 1 冊，頁 125。

¹⁴⁵ 〈莫斯科根據國際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關於中國問題之議決案致駐華武隨員訓令〉，收入《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 1 冊，頁 129。

無論如何，五卅慘案的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確實使上大小組的組織工作更為嚴密。楊尚昆於五卅運動後一年進入上大。或許因為革命熱情的高漲，與留蘇學生的陸續歸國，到了 1926 年，上大的小組活動已經趨於成熟，十分類似莫斯科東大的情形。楊尚昆說：

上海大學，黨的組織生活很嚴格。每逢星期六都要開一次黨小組會，由組長講形勢，每個黨員都要彙報自己在這個星期讀了什麼書，有什麼缺點，檢查小資產階級習氣、是不是無產階級化了、在鬥爭中是否勇敢等。那個時候倒是受了點訓練，要保守秘密，要絕對服從黨的組織。隨著北伐軍所向披靡的進軍，我們散發傳單的任務日漸增加，……¹⁴⁶

據說留蘇學生中百分之三十由上大派送，楊尚昆、張琴秋、王稼祥(1905-1974)、秦邦憲(博古，1897-1946)、陳伯達(1904-1989)、康生(張宗可，又化名趙容，1898-1975)等皆曾是上大學生。¹⁴⁷若楊尚昆的記憶無誤，上大學生至少在五卅以後，已「受了點訓練」，大致掌握蘇聯小組的政治技術，可以說隨著小組政治技術的普及，蘇聯的先進經驗與權威，此時已經開始受到中國青年的嚴格檢視。上大的小組經驗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高的標準，令上大青年難以苟同一般粗枝大葉蘇聯人的政治表現。

但 1925 年 8 月的材料顯示，「……現各支部人數都很少，只上海大學支部分成二小組」，「現只上海大學支部有小組，其他支部均沒有分組小組之可能。」¹⁴⁸10 個月後的 1926 年 6 月 17 日，在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上，中共最高領袖陳獨秀(1879-1942)又為此

¹⁴⁶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頁 20。

¹⁴⁷ 劉錫吾，〈有關上海大學的情況〉，收入《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 1025。

¹⁴⁸ 〈團上海地委的工作報告——關於組織、訓練等情況(1925 年 8 月 18 日)〉，收入《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上卷，頁 458。

特別強調了支部的真正意義：

支部二字不大好，因為容易誤解為黨的支部，俄英等名詞都不同，都是「核心」的意思。那就為社會立足點，如學生支部就為學生的核心，工廠支部為工廠核心，現在名詞雖可不改，但意義非使同學明瞭不可，……¹⁴⁹

也就是說，支部或小組的實質，從來不僅是一個巨大黨科層組織中的分支編組，而是與字面意義正好相反，支部與小組編組的目的，在於把分散於個人或小團體中的權力集中起來，發揮領導核心以少御多的作用。對立足點所在的學生團體或工廠而言，支部就是具體而微的黨中央，甚至比黨中央更重要。陳獨秀隨即指出，當時各支部卻不能發揮核心功能，尤其在教育訓練上相當無能，中央只好派人辦高級黨校與各種訓練班，加強對支部書記的直接訓練與領導。¹⁵⁰陳獨秀還指示要加強支部內「幹事會」的功能，可以理解為領導支部的特定黨小組，規模由三到七人不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專責宣傳、組織的幹事，等於是書記的左右手——組織與宣傳部長。在大一些的支部中還有負責職工與婦女等事務的幹事。¹⁵¹發揮支部核心的主要方法，還是加強其中小組的領導與分工。陳獨秀最後還不忘提醒：

149 〈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收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六年六月》(上海：出版社不詳，1989)，頁 253。

150 〈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收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六年六月》，頁 253-254。

151 〈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收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六年六月》，頁 254。

最要緊是要把支部征服其所在機關，過去發展是個人聯絡感情式的介紹，以後應以支部工作活動中去吸收同志，甚至於以後發展同志，要注意平均發展。¹⁵²

陳獨秀用「征服」二字非常傳神，因為支部是領導核心，本來就要以自己的意志統御其成員，絕不僅僅是聽從支部成員的集體決議。但當時多數支部與小組由於皆是由個人感情聯絡所形成，這意味著平等自願結合，而不是征服的原則，依舊支配大多數支部與小組的運作。以個人感情聯絡的結果，不免又是物以類聚，可以想見大多數支部恐怕皆是青年人際網絡的延伸。平均發展則是要吸收同類以外各種社會群體，如此才能擺脫組織局限在青年之中的毛病。

兩天後，時任上海區委書記的羅亦農又在區委會中批評：

同學有錯誤觀念，就是把組織當技術看，是很不對的。因組織並不在計數及列表，主要工作在把黨的政策影響到群眾，如工會如何組織，黨如何發展等，故最重要為組織工作。滬區組織工作最壞，現在士炎同志來，必可勝任。此外還要派人來做組織工作，以後與各部發生經常關係，以後就可切實指導。¹⁵³

士炎即是趙世炎，此時再次負責組織工作。羅亦農、趙世炎這對旅莫支部的老搭檔，再度擔起了規訓青年的責任。如他們所見，許多中共黨員對小組等組織政治技術的理解，還停留在製表計數的層次，不能觸及領導規訓所涉及的政治核心作用。一個月後，趙世炎又指出：

152 〈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收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六年六月》，頁258。

153 〈工運工作報告及部委對區委和上總的意見〉，收入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記錄)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六年六月》，頁291-293。

我們要指揮一個運動的基本群眾，亦要注意這個運動的聯合戰線。聯合戰線的工作，就是我們在組織上的力量的試驗。我們要精密的計算自己的勢力與敵人的勢力，亦要隨時求能擴充我們的勢力至最大限度。布林塞維克黨勝利的原因之一，就是處處為了多數的利益，取得多數的行動。¹⁵⁴

精密計算敵我勢力，進而使居於少數的中堅分子與基本群眾，得以代表多數利益，形成所謂多數的統一戰線，這顯然自旅莫支部以來，就一直是中共組織的根本策略，也是羅亦農、趙世炎等人發展支部及其下小組技術的原因。從趙世炎以下說明來看，青年對支部與小組技術的學習似乎不得要領：

大多數同志在心理上與實際上的共同錯誤，就是把「支部」二字照中國字義觀察，當著「分部」的意義來解釋，而不知「支部」這名詞，不過是譯語，在歐洲文字裡原就是「核心」之意。¹⁵⁵

這段話顯然是對中央政策的重申，也有可能陳獨秀一個月前的講話就是羅亦農、趙世炎所擬就。隨後趙世炎詳述了支部工作的具體方法，其中牽涉一些秘密聯絡與控制手段，在發表於《教育雜誌》上時被刪去，只能從他揭示的原則略窺其實際：

在支部中要分工，要有各種形式各種性質的工作，分配同志去擔任；……，每個支部有幹事會，是全支部的指導機關，是社會核心中之核心，是該社會中一個革命幹部，一個秘密的革命政府，在該社會中活動，管理該社會的各樣破壞與建設工作。¹⁵⁶

154 趙世炎，〈組織問題與支部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65。

155 趙世炎，〈組織問題與支部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66。

156 趙世炎，〈組織問題與支部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收入《趙

這個秘密的微型革命政府，很難不讓人想到幾年前蔣光赤、抱朴等人所抨擊，旅莫支部中羅亦農等四位秘密的「中間分子」。核心之核心既然是祕密的，又要如何不露聲色破壞敵方又發展成員、控制全局呢？趙世炎只給出了一個高度簡化的理想過程：

去年底，第三國際中央委員會曾召集了一次組織的會議。……有些支部書記曾作出極詳細的書面報告，……其中有一件報告說：「我們工廠(按此乃一汽車廠)工人總數不過八百，我們的同志最初不過七人。第一次支部會議我們決定發起組織工會，每人找五人，一星期後公然徵集了四十人為工會會員。於是第二次我們決定，從會員中每人應介紹兩人為同志，於是在第三星期時我們有了十八個同志。我們再決議每個同志要介紹十個工會會員，每一已入工會者(非同志)要介紹五個工會會員，第四星期時，工會會員已有三百了，我們的同志也將有五十人了。五個星期以後，八百人中加入工會的有三分之二，而六七百人的工會中，我們有一個五六十人的共產黨大支部為之核心工作，工會會務自然很有可觀，……」¹⁵⁷

僅依據公開的部分，可以將支部工作理解為分頭吸收，各個擊破的謀略，理論上只要行事隱蔽，有條不紊，確實可如細胞分裂一般，以等比級數的速度，化少數為多數，最終改變任何團體的現狀。同一時間，羅亦農在解釋對國民黨政策時，說得更為露骨，是「由『強姦』而實行『結婚』」，即以支部出其不意侵入國民黨區分部等社會團體，再以合法名義追認木已成舟的事實。¹⁵⁸

世炎文集》，頁 567。

¹⁵⁷ 趙世炎，〈組織問題與支部工作(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收入《趙世炎文集》，頁 569。

¹⁵⁸ 〈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羅亦農傳達中央擴大會議精神和對組

同年10月，惲代英也在《中國青年》上闡釋支部的核心作用。他不僅大聲疾呼「共產黨員是黨的一個細胞，共產黨的每個細胞都要是很健全而富於活動力的細胞」，¹⁵⁹對於支部的表述更是直白易懂：

應當特別注意考察群眾自己與敵人的實際力量，隨時規定出進攻或退守的合當策略，而且要能用各種方法使群眾接受我們的策略。這樣才不是跟著群眾的尾巴跑的，才能使群眾不至於走入幼稚的錯路上，被敵人打敗。¹⁶⁰

富有活動力的細胞，藉由感染周邊組織，而得以迅速複製擴散，其目的就在成為趙世炎所說的「多數」。惲代英還指出所謂多數是領導出來的。領導的技藝則與陳獨秀的「征服」類似，必須與敵人周旋，在攻守進退之間爭取主動權。諸如「征服」、「進攻」等作戰意象中，皆無可避免存在「敵人」意識。但這個敵人又不限於帝國主義或軍閥，往往是團體組織內部不服領導的勢力。支部與小組的最重要任務是創造壓倒敵手的多數，如果不能以眾擊寡，就必須暫時化敵為友，與次要敵人達成秘密協定，才能集結多數打擊主要對手，所以惲代英又說：

要能夠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難危險的環境中間去，一面很謹慎的為黨守嚴格的秘密，而一面又能很誠意的與各種可以在今天此地建立聯合戰線的人結成親密合作的關係。亦許有些人在將來對於共產黨是有危險的，亦許有些人在現在便可以與共產黨發生許多的麻煩，但是共產黨員不應當迴避這種危險與

織問題決議案的討論(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時四十三分)》，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紀錄)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出版社不詳，1985)，頁153。

¹⁵⁹ 惲代英，〈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收入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第8卷，頁348。

¹⁶⁰ 惲代英，〈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收入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第8卷，頁347-348。

麻煩，要勇敢的上前去，迎著這種危險麻煩，在這中間得著群眾，以保證我們最後的勝利。¹⁶¹

統一戰線中敵我界線是模糊流動的，或者說「群眾」中就包括潛在的危險分子。但為了長期的戰略與短期的戰術需要，共產黨人必須學會利用危險而麻煩的盟友。征服包括國民黨在內，廣義的潛在敵人，始終是中共支部小組念茲在茲的重要工作。1926年青年共產國際即指示中共，要在團中「養成強有力之政治團體」，以與「中產階級守舊之理想主義」鬥爭，並提高《中國青年》的理論水平以為輔助。¹⁶²所謂中產階級守舊之理想主義者，除了國民黨，其實也包括中共黨內具有蔣光慈傾向的青年。

上述這些做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完善了支部小組的核心功能，同時革除了過去脫離群眾，流於抽象論理的弊病，則不易判斷。就以中共在上大 1926 年 5、6 月的組織工作報告為據，我們可以從支部小組最為發達穩固的上大，大略推測條件更差地區的狀況。

根據報告，支部一面提醒黨員：「我們的工作沒有小大的分別，都是很重要的，絕無什麼好玩的或出風頭的」，¹⁶³一面加強了對小組長的訓練。經過小組討論，對小組長的談話技巧提出了比較詳細的指導。¹⁶⁴如報告所自承：

¹⁶¹ 惲代英，〈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收入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第 8 卷，頁 348。

¹⁶² 〈共產青年國際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青年聯合會之議決〉，《蘇聯陰謀文證彙編》，3，頁 745。

¹⁶³ 〈上海大學特別支部工作報告〉，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出版社不詳，1986)，頁 351。

¹⁶⁴ 〈上海大學特別支部工作報告〉，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九二七

青年團體根本沒有群眾化、青年化，團組少作用，亦未能按期開會。而每一青年團體中多數我們同志，且以一人而入數團體，而兼數職務，團內團外惟是個開會忙。我們的主張，我們的運用開會提議、建議者也或有人，而實際去做能表現出來者少人；且跑來跑去，沒有時間與非同志接近，倒使他們懷疑，開會時討厭，此又為上大青年團體中過去不好之甚者也！¹⁶⁵

一言以蔽之，小組技術淪為少數青年的自娛自樂，自顧不暇，光說不練，因此不僅沒有時間、精力去接近非同志，甚至引起他人對於小圈子操控一切的厭惡。可想而知，這樣的支部或小組很難成為社會中的核心。更何況，報告中也承認，上大學生偏向讀書，已有對小組會不感興趣的情形，也不重視國民黨與群眾工作，吸收非黨青年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等於死了」。¹⁶⁶這些現象皆說明，中共雖然高度重視支部小組，但這種政治技術並非萬能。即使明知小組有以上問題，上大的青年政治家們，或出於路徑依賴，對於小組技術還是樂此不疲。整體而言，這些現象說明此時期上大支部仍在高速擴張，重量不重質，鞏固小組領導核心等技術不是優先事項。如此一來，成員素質參差不齊在所難免。¹⁶⁷實務經驗也很難改變青年的自我認同。陽翰笙在參與平民學校工人運動的過程中，雖然逐漸領悟了語言必須平易近人的道

年一月》，頁 352。

¹⁶⁵ 〈上海大學特別支部工作報告〉，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一月》，頁 355。

¹⁶⁶ 〈上海大學特別支部工作報告〉，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一月》，頁 357-359。

¹⁶⁷ 陽翰笙，〈回憶上海大學〉，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 1040。

理，但心中始終放不下理論學習。1925年3月，也就是五卅運動前兩個月，他藉著養病的機會，與上大同學李碩勛(1903–1931)等人一齊到杭州西湖畔休養讀書。他們出發前還將上海市面可見的馬克思理論書籍蒐羅一空，來到西湖畔就過上每日散步讀書的悠然生活，直到五卅前夕，方被忙於籌備示威遊行的何秉彝(1902–1925)寫信召回，但等他們6月1日動身回上海時，何秉彝已經犧牲在英國巡捕的槍下。¹⁶⁸這再次表明，雖然上大學生在組織動員群眾方面，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但他們喜好抽象思辨的青年小組習氣，則自從非基督教運動以來，沒有根本改變，仍舊妨礙他們真正打入群眾。

五、結論

舒新城在1941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如此評價道爾頓制：

當時教育上之各種新學說與新方法的介紹，也如政治上、經濟上之各種主義一般，只要一有發現，便介紹進來。介紹者並對於所介紹的東西每每出於一時之偶然，而社會上則往往發生甚大之反應及影響——實是由於當時國人精神上的飢渴太甚。「五四」以後，民治主義的教育思想固已瀰漫中國，設計教學法之試行，亦通行於著名小學校；中學方面，雖一般著名學校競相試行新學制，但在教學方面設計教學不甚適宜，……道爾頓制傳到中國以後，……於是全國風動，教育刊物之論文幾以道爾頓制為主題，各地中學校多有準備試行，而小學之試行者已不在少數。全國教聯會有新制中學師範試行道爾頓制之決議，有些學校的招生廣

¹⁶⁸ 陽翰笙，〈回憶上海大學〉，收入《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大學》，下卷，頁1042–1043。

告，且有以行道爾頓制為號召者。全國教育界對於道爾頓制好似中了魔一般地鬧個不休。¹⁶⁹

字裡行間不難看出，當年狂熱的首倡者舒新城，對「中了魔」的自己多少有些反省，從而對青年自主學習的能力也有了更為務實的看法，如他自承：

青年在學問上因為識力不足，最易採納虛聲；在情感上，只要接觸時相見以誠，也容易發生信念。那時我們都是年青的人——夏丏尊最長，也不過三十一、二歲——而且是書生，對於社會的機詐未經習練，且在教育思想上受著個性發展的影響——以我所受之影響為最大，……¹⁷⁰

舒新城等青年屬於意識形態並不強烈的書生，對強調政治的列寧主義敬而遠之。然而也正因如此，他們最容易受到看似無政治性的人文理念影響。舒新城的好友，也是留英學人的余家菊(1898-1976)，在英國參觀道爾頓制學校時，因為校長室牆上的標語「Don't Judge: Try to Understand(不要批判，且去了解)」而大受感動，也成為道爾頓制的熱情鼓吹者。¹⁷¹將近二十年後，他終於逐漸意識到，道爾頓制的風靡一時，主要是五四後思想真空又盲信民主的結果。表面上是個人偶然的自主選擇或走火入魔，實際上是宏觀歷史中必然的政治現象。有趣的是，舒新城又頗為得意地在回憶錄中，敘述自己另一部寫於1927年的教材《宣傳術與群眾運動》。此書本是受從事宣傳的國民黨部朋友委託下的機緣巧合之作，但舒新城在該書序言中自道：

是因為人類是群性的動物，自初生以至老死，均不能離群索居，人與人之間，便不能不有交往，也便不能不利用語言、文字及藝

¹⁶⁹ 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頁219。

¹⁷⁰ 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頁151。

¹⁷¹ 余家菊，《回憶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頁2。

術品等以為傳達思想的工具；……近年來，每一種重大問題發生，不問其範圍是屬於外交的內政的、地方的、學校的，若有所活動，其組織中必有所謂宣傳組，有專人司其事。然而宣傳的目的何在？宣傳之方法如何？被宣傳之群眾其心理如何？應如何領導控制？恐很少有人為精密之研究。本書作者固然不曾從事於政治的宣傳，但鑒於一般青年之不明群眾心理，不明宣傳要點，以致發生許多無謂的糾紛，心實有所不安，因本其十餘年來從事廣義宣傳各方面之經驗寫成此冊。¹⁷²

舒新城是無黨籍人士，交友圈中不乏惲代英這種活躍的中共黨人、青年黨要人余家菊，也有不少國民黨人。但他自認不是任何黨派組織權威的信徒，¹⁷³有意避開政治，不肯做政治的宣傳。然而長年從事教育工作和研究教育心理學，舒新城能意識到傳播思想理念(教育)這種廣義宣傳，和傳播政治理念這種狹義宣傳之間，至少在方法手段上，有著太多的共通性。由於他心目中的教育，就是傳播思想，其實與傳統的教育意涵，已然發生本質上的變化。所以他認知的教育和政治宣傳，內容也許不同，卻共享著一套(以裴斯泰洛齊式的眼光)探察受眾(學生、群眾)心理，以及規訓，進而領導控制受眾行為的精密技術。誠然，舒新城是個政治外行人，對於政治宣傳的理解存在許多想當然耳。可在此，他竟像那個得意地指出國王新衣本質的小孩，戲劇性的把現代的教學方法和現代政治技術之間的窗戶紙，一下子給捅破了。然而從本文論述也可看出，個人的動機為何其實並不重要，在青年政治的宏觀歷史結構中，自由研究的教育實踐，與小組中醞釀的列寧主義組織技術，本來就不是涇渭分明，而是在許多層面殊途同歸，合流為一套相互為用的青年政治技術體系。藉由道爾頓制等「先進」歐式教育「自由研究」的理念，小組得以迅速在中

¹⁷² 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頁372。

¹⁷³ 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頁374。

國蔓延開來。蘇聯影響當然重要，但只是這道歐式教育大潮中的一股激流。如本文所示，早在中國學生赴蘇學習以前，惲代英、舒新城、朱光潛等人透過非馬列主義的途徑，也已朝發展小組政治技術的方向前進，他們或自學、或育人，迅速養成一個熟悉小組與論理技術，以領袖自居的青年群體。然而，相較於領導群眾的具體政治實踐能力，自由思辨、抽象論理的政治技術，始終更受青年重視。這群人總是從抽象普遍話語中得到真理，再以之指導實際政治的走向。許多上大學生甚至抱持這樣的理念來到蘇聯留學，反過來質疑蘇聯教育之不重視理論與小組，足以表明莫斯科對上海並非單方面的輸出先進經驗，實際上亦不時遭受來自上海的某種青年政治原教旨主義的挑戰。

也因如此，無論動員工農群眾時如何力不從心，小組與抽象論理對青年的吸引力歷久不衰，不因國共的分裂而改變。青年政治的歷史結構不變，類似的政治實踐技術就會繼續為人採用與發展。費時將近二十年，中共才終於克服小組等青年政治技術的個人主義限制，大致上做到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故能得其利而不受其害。在此期間，個人自由的理想，就如天際燦爛奪目的落日，青年越是窮追不捨，越是精疲力竭，受控的身影也越發深長，而映照出的形貌，也就益發顯得光怪陸離了。

(本文於2025年10月7日收稿；2026年5月14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之國際年輕傑出學者研究計畫(MOST 111-2628-H-001-006)成果，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2025/09/04)，得到與會學者的批評指教，以及《新史學》編委會與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徵引書目

一、史料文獻

- 《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編委會編，《20 世紀 20 年代的上海大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
-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紀錄)一九二六年七月——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出版社不詳，1985。
-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一九二二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出版社不詳，1986。
-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議紀錄)一九二六年四月——一九二六年六月》，上海：出版社不詳，1989。
- 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室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四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 9、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 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中華民國留俄同學會，中華文化基金會編，《六十年來中國留俄學生之風霜踔厲》，臺北：中華文化基金會，1988。
-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 王來棣採訪、編輯，《中共創始人訪談錄》，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著，徐維東譯，《本雅明論教育：兒童·青春·教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

- 朱光潛，〈在「道爾頓制」中怎樣應用設計教學法〉，收入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23，第 11 章，頁 168–184。
- 朱光潛著，吳福群、錢理群、商金林編訂，《朱光潛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 余家菊，《回憶錄》，上海：中華書局，1948。
- 京師警察廳編譯會，《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
- 抱朴，《赤俄遊記》，上海：北新書局，1927。
-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
- 張品興編，《中國二十世紀散文精品：丁玲卷》，臺北：太白文藝出版社，2002。
- 盛岳著，奚博銓等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 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
- 彭軍榮編，《紅場記憶：中共早期留蘇檔案解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 彭述之著，程映湘、高達樂(Clande Cadart)編撰，《彭述之回憶錄(上卷：中國共產主義的起飛)》，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
- 惲代英著，李良明編，《惲代英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舒新城，《民國教育先驅——舒新城回憶錄》，臺北：獨立作家，2025。
- 舒新城，《道爾頓制概觀》，上海：上海中華書局，1923。
- 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 靳樹鵬，〈百歲老人評說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雙月刊》，5(香港，1999)，頁 72–74。
- 廖世承編，《東大附中道爾頓制實驗報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 趙世炎，《趙世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蔣經國，《蔣經國先生全集》，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第 1 冊。
-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
-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謝懷丹，《歲月履痕：一個莫斯科中山大學女生的回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 羅亦農，《羅亦農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Ognev, Nikolai. *The Diary of a Communist Schoolboy*. Translated by Alexander Werth. New York: Payson & Clarke Limited, 1928.

二、近人論著

- 王龍飛，《全民皆兵：太行根據地的武裝體系》，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

- 方一戈，〈青年蔣經國與「江浙同鄉會」冤案〉，《文史春秋》，2003：2(南寧：2003)，頁 29-31。
-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 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北縣：稻鄉出版社，2008。
- 李永昌，〈關於「江浙同鄉會事件」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04：5(北京，2004)，頁 81-87。
- 李志毓，〈中國革命中的小資產階級(1924-1928)〉，《南京大學學報》，2015：3(南京，2015)，頁 78-94。
- 李志毓，《大浪淘沙：中國革命中的國民黨左派與知識青年(1920-193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5。
- 余敏玲，〈中共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期運作之蘇聯因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8(臺北，2022)，頁 89-139。
- 余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9(臺北，1998)，頁 103-130。
- 余敏玲，〈國際主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193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臺北，1996)，頁 235-264。
- 汪正晟，〈青年自我與延安整風〉，《新史學》，32：1(臺北，2021)，頁 117-172。
- 汪正晟，〈青年政治運動之底蘊與兩難——以浙江各縣戰時政治工作隊為例(1938-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05(臺北，2019)，頁 91-147。
- 汪正晟，〈從青年敘事論國民黨小組會議與中共政治技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5(臺北，2022)，頁 51-111。
- 宋泓，〈開會：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基層政治〉，《清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7：4(北京，2022)，頁 113-127、225。
- 周憑欄、周冰洋、周太和，〈館藏檔案揭開莫斯科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事件歷史面紗〉，《黨史博覽》，2023：3(鄭州，2023)，頁 70-72。
- 馬思宇，〈三黨競訓與 1920 年代中國政黨訓練的源起〉，《民國檔案》，2022：2(南京，2022)，頁 119-130。
- 夏濟安著，萬芷均等合譯，《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
- 陳永發，〈中共建國初期的工商稅收：以天津和上海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8(臺北，2005)，頁137-187。
- 陳訓明，〈周達文同王明宗派主義的鬥爭〉，《貴州社會科學》，2008：11(貴陽，2008)，頁96-101。
- 陳斌，〈俞秀松革命生涯和思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9。
- 孫會修，〈「發表力」的養成：中國共產黨早期留蘇學生的談話訓練〉，《近代史研究》，2021：3(北京，2021)，頁59-76、160。
- 孫會修，〈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區委的城市支部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北京：2016)，頁50-60。
- 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的幹部訓練(1921-1926)〉，《民國檔案》，2025：1(南京，2025)，頁108-118。
- 孫會修，〈中共旅莫支部清除小資產階級思想運動與幹部教育(1921-1926)〉，《史學月刊》，2022：2(開封，2022)，頁66-79。
- 孫會修，〈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小組指導員問題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24：2(北京：2024)，頁111-123。
- 孫會修，〈旅莫支部成員的入黨之路與中共早期組織建設〉，《歷史研究》，2021：4(北京，2021)，頁114-138、222-223。
- 孫會修，〈旅莫支部歸國幹部與大革命期間中共組織制度的改造〉，《中共黨史研究》，2015：5(北京，2015)，頁10-20。
- 孫會修，〈組織熔鑄與個人努力：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成長〉，《黨的文獻》，2018：6(北京，2018)，頁112-121。
- 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
- 盛差偲，〈全民族抗戰時期國民黨對中共組織建設理論的借鑒——以《黨的建設》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24：4(北京，2024)，頁104-115。
- 張瑞德、馮啟宏，《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4。
- 張歷君，《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 張澤宇，〈莫斯科東方大學旅莫支部述論〉，《廣東社會科學》，2011：4(廣州，2011)，頁24-30。
- 黃江軍，〈整風運動的技術史：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中心〉，《抗日戰爭研究》，2022：1(北京，2022)，頁67-80、160。

- 黃金鳳：〈從「第二黨」到後備軍：共產黨與青年團早期關係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11：3(北京，2011)，頁123-138、161。
- 黃道炫，《鐵水流：戰時中共革命系統的運作，1937-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
- 楊奎松，〈「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續)〉，《近代史研究》，1994：4(北京：1994)，頁213-241。
- 楊奎松，〈「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3(北京：1994)，頁193-219。
- 趙諾，《太行山上：中國共產黨太行根據地幹部政治成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 鄭玉卿，〈道爾頓方案理念及其在中國東南大學附屬中學的實驗〉，《課程與教學季刊》，2(高雄，2012)，頁147-168。
- 劉明鋼，〈王明「左」傾宗派集團與莫斯科中山大學〉，《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武漢，2007)，頁10-13。
- 劉蔚之，〈教改論述的歷史經驗分析——以近代中國推動兩個外國教學法為例〉，收入中國教育學會主編，《教改20年：回顧與前瞻》，臺北：學富文化，2014，頁97-127。
- 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史縱橫》，1989：1(瀋陽，1989)，頁38-39。
- Cong, Xiaoping (叢小平). *Teacher's School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7.
- Gillis, John R.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London: Academic Press INC, 1981.
- Hoare, Quitin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it and translate.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2.
- Lanza, Fabio. *Behind the Gate: 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 Perry, Elizabeth.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loeg, Piet van der. *Dalton Plan: Origins and Theory of Dalton Education*. Deventer: Saxion Dal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 Rahav, Shakhar.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ong, Mingwei (宋明煒). *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6.
- Sorokin, Alexander and Sakharova Elena. “Dalton-Plan in the Context of Reforms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in Soviet Higher Education in 1920–1930s.” *The Anthropologist* 23:1/2 (2016): 120–125.
- Walker, Barbara. “Kruzhok Culture: The Meaning of Patronage in the Early Soviet Literary World.”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1:1 (February 2002): 107–123.
- Wasserstrom, Jeffrey.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hipple, Guy M., ed. *Adapting the Schools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 Twenty-Fourth Yearbook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Part II. Bloomington: Public School Publishing Company, 1925.

The Non-Leninist Origins of Small Group in the 1920s: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Youth Political Technology

Chen-cheng W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henomenon and origins of small-group habitus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youth political technology. It argues that group-based political techniques were not introduced solely from the Soviet Union. Even before China turned to Russia as a model, Chinese youth had already encountered group practices through channels from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experimenting with the Dalton Plan teaching method, Zhu Guangqian envisioned an ideal in which individual freedom could be cultivated through collective group life. Many Chinese youth who studied in the Soviet Union directly applied the Dalton Plan's vision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o cadre schools such as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thereby forcing the CCP Branch in Moscow and Soviet schools to adapt and improve. Even after receiving training in democratic centralism, students at Shanghai University under GMD-CCP cooperation retained a strong small-group habitus centered on free inquiry. Group political techniques, then, were not so much products of Leninism as the natural outcome of introducing European educational ideals within the global framework of youth political structures.

Keywords: National Revoluti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Leninist

Party, small group habitus, Dalton Plan, the Branch of the CCP in Moscow, political technology, Youth Politics, Shanghai Universit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